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Colleg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信用卡對幸福感之影響效果－
來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的實證研究

Credit Card Effect on Happiness from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Data

張惠甄

Chang, Hui-Chen

指導教授：曾永清 博士

Advisor：Tseng, Yung-Ching, Ph.D.

中華民國110年6月

June 2021

謝辭

始終慶幸有機會在大學畢業之際能持續往上攻讀，順利考上師大公領所。細數在研究所就讀的三年來，深受眾人幫忙，過程中感謝研究所同學彼此扶持與打氣。也感謝永清老師、智元老師提供我擔任 TA、RA 的機會，讓我在經濟上不致匱乏，順利於 2021 年完成教育學程與論文，取得碩士學位。回顧撰寫論文的點滴，經常跑去國家圖書館查找文獻，翻閱各式國內外文獻、統計書籍，以及不斷調整內文組織架構，才逐漸精煉出些研究脈絡。另外本研究資料由 CHFS 中心釋出，感謝永清老師與上述機關提供數據資料協助，方能在過去一年內抓準步調與時間產出此篇論文，實屬感激。

然而，順利完成論文最大的幕後推手肯定是我的指導教授－曾永清老師。感謝老師儘管手邊有許多學生，仍願意指導我的碩士論文。感謝永清老師總在我遇到研究難關時指引我修正方向，提供我更多廣度與深度的思考，讓我有機會在研究上擁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另外老師在研究方法上的指導更是受益良多，十分感謝老師的用心與信任，能讓老師指導實在是件很幸運的事！

再者，感謝擔任我的碩士論文口試委員－邱哲修、郝充仁老師，感謝兩位老師一路以來給予我的研究建議，讓我有機會再重新審視論文的內容架構與探找各種研究上的突破點。很謝謝哲修老師，提供不少統計方法上的專業建議與回饋，另外也感謝過往於淡江就讀教授過我的充仁老師，提供我不少文獻探討、對中國大陸現況分析上的擴充，彌足感謝兩位口試委員用心的提供建議與蒞臨！

最後，想感謝論文幕前與幕後的小幫手，感謝佳君協助我查找下載許多中國文獻，另外還幫忙論文文字、排版校稿。感謝積昀協助我後期整份論文的文字校稿。以及當天協助口試現場的惟堯、育綺、宛宜，謝謝你們的協助，得以順利完成一二階口試。一路以來受到許多貴人的幫助，就讀研究所期間獲得不少社會科學的啟發，期盼在未來日子裡，能持續將探究、社會觀察的精神運用於生活中。

惠甄 2021.6.18

摘要

隨中國家戶負債逐年攀高的趨勢，間接可能影響居民的生活滿意度。本研究利用 2015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數據資料，探討信用卡負債影響居民幸福感程度，同時納入理財知識、理財態度與風險態度對信用卡欠款餘額之關係探討。另說明不同背景變項對幸福感之顯著差異，及與不同背景變項、自變項與信用卡欠款餘額的相關性。本研究使用 ordered logit model 欲得出幸福感之預測機率與各變項對幸福感之邊際效益。統計結果發現人口變項對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大多具有顯著差異，且「女性、教育程度、共產黨員、健康狀況、資產、風險態度、信用卡欠款餘額」對幸福感具有顯著效果。其中女性相較男性、共產黨員較非共產黨員身分者幸福感勝算比高，另在不同程度的幸福感邊際效應下出現正負向效果。

關鍵字：CHFS、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理財知識、理財態度、ordered logit model

Abstract

With the rising household debt in China, it may indirectly affect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s. This study used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 in 2015 to explore the extent to which credit card debt affects residents' happiness. At the same time, it used financial knowledge, financial attitude and risk attitude to illustr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happiness. Besides, this research also fou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dependent variable,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credit card balance. This study used the ordered logit model to obtain the prediction probability of happiness, and the marginal probability of various variables to happiness. Finally,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found that background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and credit card balance, and "female, education level, CCP members, health status, assets, risk attitude, credit card balance"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happiness. Among them, women have a higher odds ratio in happiness than men, and CCP members' happiness odds ratio also higher than those who are non-CCP members. In addition, there are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ginal effects with vary degrees of happiness.

Keywords：CHFS, happiness, credit card balance, financial knowledge, financial attitude, ordered logit model

目次

表次

圖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壹、伴隨經濟成長，中國金融負債攀升快速

隨全球債務穩步上升，多數國家的借貸水準有逐年提高趨勢。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2020 年 9 月數據顯示，全球債務總額已達到 272 兆美元，預估佔全球 GDP 比重 365%（林薏禎，2020）。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快速攀升，年均增長率超過 9%（陳岩，2021）。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資料顯示，2019 年世界 GDP 達 87.735 億美元，而中國 GDP 為 14.28 萬億美元，增長達 5.95%（The World Bank Group, 2021），居世界排名第二，約占全球 16.27%份額，僅次美國。

然而隨經濟高速成長，中國居民家庭負債與個人信用卡貸款也持續攀升。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發佈報告指出，中國 2019 年第一季中國企業、家庭、以及政府的債務總規模已升至 GDP 的 303%，去年同期為 297%，約佔全球債務的 15%（中國財經，2019）。2018 年末，美國人均信用卡持卡 3.37 張，中國人均持卡量僅為美國的七分之一。值得留意的是，中國信用卡交易總額增長幅度快速，信用卡貸款餘額由 2008 年末的 0.16 萬億元快速增至 2019 年末的 7.59 萬億元（天風證券，2020）。2009 年以來，信用卡交易額實現了 10.4%到 25.6%的 GDP 增長（中國產業信息，2018）。此表明信用卡使用頻率提高，一定程度上也拉動居民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另外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也顯示，中國居民個人消費貸款餘額近年間同比增速保持在 30%左右，說明中國居民透過信貸進行消費的意識快速增強（甘梨、王紹文，2019）。如下方圖片所示，中國個人信用借貸餘額攀升趨勢，應是目前中國經濟成長下須持續關注的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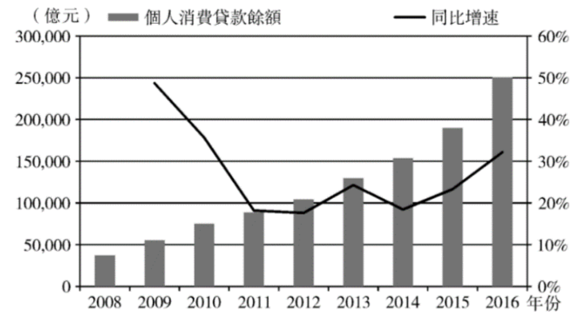

圖 1-1 中國近年個人消費貸款餘額與增速圖

資料來源：甘梨、王紹文（2019）。**中國家庭金融租賃研究**。臺北市：財經錢線文化，頁 38。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資料。

貳、 信貸擴張的慘痛歷史經驗

根據歷史的經驗，經濟高速的成長，常常會帶來個人金融負債過度擴張，最後導致信貸危機，這是一個全球性的普遍現象（張允碩，2011）。在金融科技的革新進步下，信用卡產品的問世影響了人類消費習慣，從抵押貸款向信用貸款跨出的一大步，逐漸朝個人金融、借貸消費需求開發。銀行為求消費金融業務成長，當時眾多銀行業者紛紛推出「別讓金錢阻礙了你的夢想」、「George & Mary（借錢免利）」、「借錢是一種高尚行為」等信用卡推銷廣告資訊。然而在金融環境尚來不及跟上快速成長的信用卡市場，衍生出不少卡債問題，成了全球各地的社會負擔與衝擊。在過往經驗中，美國、韓國、台灣與香港，都曾發生過類似的信貸危機。然而各國卡債事件背後反映以下兩點。其一，因消費者欠缺良好理財觀念而過度舉債，銀行不當催收或委外民間催收，造成暴力討債事件頻傳，不少債務人因龐大財務壓力而自殺；其二，因政府監管機構未即時監控潛在風險，發卡銀行陷入惡性競爭，濫發信用卡導致呆帳嚴重與虧損，間接衝擊民生消費並影響該國經濟發展。（林姿儀，2007；張允碩，2011）。

卡債風波引發許多社會後果，讓世人警惕起自身的消費習慣，及意識信用卡循環利息的威力。儘管信用卡提供消費者多元且便捷功能，但背後也因

使用者對信用卡的理財知識、風險態度而有著不同的理財行為。在利率幻覺縱容透支消費下，一旦逾期繳款，信用卡的循環利息恐使小錢滾大錢，影響原先生活的經濟開銷甚至可能造成家庭成員沉重的財務壓力或心神損害。

參、經濟行為的終極目標納入幸福衡量

近年來，除廣受大家重視的全球競爭力及國家競爭力指標外，幸福程度也成為國民及政府所重視的部分。幸福指數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幸福程度的指標體系，然而最早將幸福當作量化指標的國家就是不丹。隨後，全球許多國家陸續提出「幸福指數」，以向全球表示國家的「幸福快樂程度」，藉此反映該國居民對生活的感知與滿意度。因此針對幸福指數衡量相關研究逐漸在學界廣泛討論，也是當局政府欲了解的重要面向之一。

然而在二戰結束後，興起人本主義思維，人們開始重視起生活品質、幸福感等問題，更加留意自身的生活壓力、健康與適應…等問題，因此也開始重新定義幸福的意義。然而人類生活始終與金錢離不開關係，以長期而言，理財管理技能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至關重要。隨經濟消費形式改變，互聯網提供人們便利的購物途徑外，信用卡產品更提供簡單現成的透明借貸手段，因此吸引許多人們花錢消費，然而這般新型消費形式，如消費者未拿捏恰當恐對理財福祉（financial well-being）造成嚴重威脅。關於理財福祉的報告曾指出，高債務、低收入和理財知識水準低落問題，可能對個人的理財福祉產生不利影響。其中年輕人在理財方面表現，如退休儲蓄、智能投資、信用卡使用和債務方面上較無概念，因此易陷入經濟壓力和財政困難，致使理財福祉低落（Lusardi, Mitchell & Curto, 2010）。人生階段中經濟行為將持續影響個人幸福感，不論是學習理財知識或是正負向的理財行為，都可能影響他們一生的決定。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 2008 年至 2016 年中國居民個人消費貸款增長快速，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個人消費貸款餘額近幾年同比增速保持在 30%左右，反映了中國居民信貸需求的增長（甘梨、王紹文，2019）。然而人的理財知識應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與態度（Hilgert, Hogarth & Beverly, 2003）。國外研究發現，以大學生在個人理財和使用信用卡的方式上，存在明顯的差異。一些人因擁有穩健的信用評級，具有成功的理財技能；而另一些人則陷入信用卡債務、逾期帳單及債務處理能力不足（Shim, Xiao, Barber & Lyons, 2009）。因此學習理財技能將是人生階段的主要發展任務之一，不論是學習理財知識或是養成正確的理財習慣與行為，都可能影響他們一生的決定。故本研究特別引入理財態度、風險態度的變項進行說明，對此設立幾個基本假設，考慮個人理財知識、態度影響幸福感的途徑。

因家庭的經濟行為會受到負債影響，進而影響居民的幸福感。債務水平是整體生活和理財狀況的重要決定因素（Brown & Gray, 2016）。結合幸福經濟學的觀點，過往研究指出於理財行為中，透過消費、健康兩種行為途徑影響人類心理因素，因而使負債對幸福感產生正負向的不同效應，當居民透過借貸滿足當前消費，能提高經濟生活滿意度與增加幸福感（李江一等人，2015），另方面如承擔過大的債務壓力時，很可能造成債務人負向情緒與影響健康狀況（Krause et al., 1991; Adams et al., 2007; Drentea & Reynolds, 2012; Archuleta et al., 2013）。然而正向積極的的現金管理、信貸管理和儲蓄等理財行為與理財福祉有著正相關（Xiao, Sorhaindo & Garman, 2006; Xiao, Shim, Barber & Lyons, 2007; Shim et al., 2009; Xiao, Tang & Shim, 2009），其中對於大學生使用信用卡研究發現，正向的理財行為與經濟壓力的減輕有關（Hayhoe, Leach, Turner, Bruin & Lawrence, 2000）。除此之外，針對中國大陸在負債與幸福感相關研究中，衡量負債行為多採用虛擬變數，意即以有無使用二分法的操作性方法表示，較難觀測行為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故在此研究中欲針對此變項加以調整。

然而目前幸福經濟的研究中仍存在多數偏誤或是解釋效果不甚強烈，有鑑於每個個體特質、背景與經歷皆不同，故本研究主題欲以廣泛和綜合的框架來發展，從行為探討與幸福感的關係外，更加入內在層面的理財知識、態度，說明負債行為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並在本次選用採中國分層比例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庫，有助反映中國居民的生活狀況。

雖然目前中國行動支付成長快速，根據資誠國際會計師事務所《2019 全球消費者洞察報告》指出，中國行動支付普及率高達 86%（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暨其策略合作夥伴，2019）。其中行動支付的應用範圍包含 P2P 電子紅包、交通票證、掃描條碼支付…。在行動支付的模式上，可分為預付與後付模式，前者以儲值金扣款方式，取代付現找零。後者預先綁定信用卡或金融卡，消費者透過支付平台直接使用信用卡刷卡或金融卡扣款，完成消費支付活動，因此行動支付不單專指一項支付工具，而是泛稱的名詞。然而本次未選用中國大陸普及度高的行動支付，原因共兩點。其一，本研究選用使用信用卡中的欠款餘額，著重信用卡當中「先消費，後支付」的借貸功能，而行動支付主要是透過行動載具消費的媒介，其扣款的方式涵蓋面向廣，恐無法真切反映民眾對預借現金、欠款未還的情況；其二，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的訪查問卷，未設計此選項，故無相關資料做進一步探討。

因此，針對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說明理財知識、態度、信用卡使用行為對幸福感之解釋能力，與探討信用卡欠款餘額對幸福感之影響程度。本研究的預期貢獻，共以下三點。其一，將理財知識、理財態度與風險態度納入影響幸福的途徑探討；其二，修正過往實證研究中的操作性變項，加入觀測信用卡之欠款餘額對幸福感之預測影響程度；其三，使用中國大陸資料庫大量樣本以說明評測效果，較具有資料分析的意義。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本研究的信用卡使用行為以欠款餘額進行探討。針對上述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茲將研究問題、研究假設分述如下：

壹、 研究問題

一、信用卡使用行為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

二、理財知識、態度與風險態度對幸福感的影響。

三、背景變項與幸福感的關聯性。

四、背景變項、自變項在不同幸福感中的預測機率與邊際效應。

貳、 研究假設

一、 不同背景變項之個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一)不同性別之個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齡階段之個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教育程度之個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四)是否為共產黨員身分與個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健康狀況之個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六)有無上過理財課程對個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二、 不同背景變項之個人信用卡欠款餘額有顯著差異。

(一)不同性別之個人信用卡欠款餘額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齡階段之個人信用卡欠款餘額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教育程度之個人信用卡欠款餘額有顯著差異。

(四)是否為共產黨員身分與個人信用卡欠款餘額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健康狀況之個人信用卡欠款餘額有顯著差異。

(六)有無上過理財課程對個人信用卡欠款餘額有顯著差異。

三、 不同背景變項、理財知識、理財態度、風險態度對幸福感有顯著解釋能力。

(一)不同背景變項對幸福感有顯著解釋能力。

(二)理財知識、理財態度、風險態度對幸福感有顯著解釋能力。

四、 信用卡欠款餘額對幸福感有顯著解釋能力。

第四節 研究限制

針對本研究限制提出說明，回應研究問題、結果恐帶來的影響限制，以下共五點說明：

壹、 研究結果難與他國比較

本研究採用 2015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資料進行分析，雖中國與台灣亞洲華人生活文化圈相似，但在消費習慣與金融政策面上著實有不同的做法。如中國居民以使用行動載具消費的普及率高、信用刷卡機駐店的比率低，且中國居民申請信用卡的額度不高，因此本研究結果恐無法與其他國家相互比較。

貳、 未取得最新資料庫

在研究對象上，研究範圍僅針對中國國家居民狀況，故此研究結果不一定能類推至其他國家。另在時間限制上，因申請 2017 年最新發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未審核通過，故採用 2015 年申請核准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資料進行橫斷面剖析。然而隨時序的演進，恐難類推現階段中國家庭的信用卡使用狀況與幸福感。

參、 變項衡量

因選用資料庫分析，無法自擬完整問項以衡量變項，故在研究中選用較為適切及符合研究需求的問項內容進行分析。

肆、 樣本取用

因本次資料庫以電訪方式詢問中國居民，故資料處理上恐受電訪人員記錄完整性影響，另回應家庭財務狀況時，因偏向隱私問題，答案恐與現實落差。另外在樣本選取上，使用中國金融家庭中心家戶資料進行分析，恐無法真正透視個體真實的財務狀況。故在本次資料處理上，選擇家庭戶主與受訪者相同之樣本，因家戶長多為主要家庭經濟來源，故以家戶整體財務狀況代表家戶長個人，在推估信用卡欠款餘額與幸福感上具合理性。

伍、 未選用行動支付

另外在本研究中，主要探討中國居民信用卡欠款餘額對幸福感的影響狀況，未選用中國目前相對普及的行動支付，有鑑於本研究欲著重持信用卡使用者的欠款行為，故選用信用卡欠款餘額作為研究變項。其次在本資料庫中未調查居民行動支付的情形，故在本次研究中未納入討論。未來如需探討中國居民消費習慣或行為對幸福感的影響時，可再納入行動支付的變項進一步分析。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幸福感相關理論與研究

壹、「幸福」名詞釋義

「幸福感」（Happiness）是心理學中常提及的抽象概念，因應個人詮釋而有不同的解讀。早在古希臘時期，幸福稱作 Eudaimoni，有人翻譯為「至福」（Glückseligkeit），原意為「道德、德行」的意思。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採道德理智主義（Moral Intellectualism）的立場，認為幸福存於德性與知識之中，使靈魂得趨於至善（國家教育研究院，2010）。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認為主張幸福的生活即是至善生活的實現，為最高德性的活動，且指稱整體的人生過程而非短暫的狀態。從上述可知，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所提出的幸福，應是一種外在標準，以道德作為衡量基準的善。然而因幸福所指涉的意思過於抽象難以具體化，且常落於個人主觀意識判定，難以找出一致客觀的幸福衡量標準。因此，為使幸福概念具體化，學界開始定義幸福這個抽象名詞與內涵。著名經濟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將幸福量化，讓原先抽象化的道德心理學，轉為以數字量測的方法，進而衡量人類一切行為價值的標準，使名詞能更明確聚焦。

因「幸福」一詞所涵蓋的範圍太廣，故針對經濟學文獻中釐清常混用的字詞定義。像是幸福（happiness）、快樂（happy）、福祉（well-being）、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生活階梯（ladder-of-life）與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幸福一詞雖受到許多公眾與學者關注，但也是其中定義最廣泛開放且不明確的字詞。這些詞彙的意義不同，但彼此間具有相關性，以下針對個別字詞進行概念釐清：

一、快樂（happy）

快樂經常被當作幸福的代稱，但兩者的意義具本質性的不同。快樂是幸福的基礎，但彼此又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苗元江，2007）。學者進一步說

明，快樂是陳舊且浮濫的用語，幸福感則是一個進階的概念（Seligman, Ernst, Gillham, Reivich & Linkins, 2009）。幸福感背後具有精神價值且富有意義性的內涵，具備正向態度的素養、高度的生活滿意度，以及自我實現的意念。因此幸福與快樂兩者雖相近，但仍有本質性、長短期狀態的不同。

二、福祉（well-being）

對人類福祉的總體評鑑，其範圍超越收入所能準確捕捉或是衡量的元素。是一個涵蓋較廣面向的條件，涵蓋客觀條件，例如生活品質、健康、生活、收入、環境品質和社會聯繫…等面向的生活滿意度。亦包含主觀的知覺，例如個人正負面狀態、生活價值或成就感。在國內文獻中幸福所引述的英文也可能會以 well being 表示，譯為幸福、福祉、安適或良好狀態。而各國學者針對建設健康富足的社會議題研究中，幸福感通常以「happiness」或「well-being」兩個同義詞稱之（余民寧，2015）。然而本研究採以此概念作為幸福感定義，並使用 happiness 一詞，進行後續分析。下半部分將詳細說明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客觀幸福感（Objective Well-Being）。

三、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

「生活品質」一詞大多出現在醫學、護理亦或是社會科學領域當中。然而因外文翻譯，各國詮釋與用詞略有差異，像在中國研究中所使用的是「生活質量」一詞。心理學家認為生活品質為個人對其日常生活、婚姻、財務狀況、朋友等的滿意感受（姚開屏，2000），因此在實證研究中，經常用滿意與不滿意來呈現個人對生活品質的評價。Ferrans 與 Powers 也曾於 1985 年為生活品質所下的定義，是個人幸福的感受，與自覺日常生活中重要部分獲得滿足的感受有關，強調個人自身的感受性與自覺重要性的部分滿意與否的狀態有關（Ferrans ＆ Powers, 1985）。意即生活品質通常代表個人對生活的總體評價，且多強調外部因素，如環境和收入。

四、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

「生活滿意度」其範圍更限縮，且與收入的關聯性較高，除了主觀意識與當下感受的幸福感外，更評估自身的客觀整體生活條件。然而生活滿意度的答案，會與幸福問題的答案息息相關（吳書榆譯，2013）。而此說法也正如學者對幸福感的定義，為持久、完整，對整體生活的滿意度詮釋（Tatarkiewicz, 1976）。

五、生活階梯（ladder-of-life）

生活階梯在國外稱為坎特里爾梯子（Cantril Ladder），是目前蓋洛普全球調查（Gallup World Poll）的研究之一。其概念與國外研究報告中的「幸福指數」相近。在許多研究中，它被用作一種簡單的方法來要求人們對他們目前對生活或幸福的滿意度進行評估，其中 Cantril 生活滿意度量表 0 到 10（Cantril，1965）。然而在生活階梯問題上相較侷限，與生活收入關聯性高，與生活滿意度關聯性較低，因多數受訪者會都會用全國或國際參考標準來比較自己的生活（吳書榆譯，2013）。聯合國根據受訪者對自己生活的評價對國家幸福進行的排名，每年發行的刊物中，進行個國家的幸福評比。於《2018年世界幸福報告》對幸福指數（或「生命階梯」）的定義如下：

測量的題目，會請想像一個梯子，其梯級的編號從底部的 0 到頂部的 10。梯子的頂部代表您可能的最佳人生，而梯子的底部代表您可能的最不理想的人生。您會說自己現在站在階梯的哪一步？（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8, p.48-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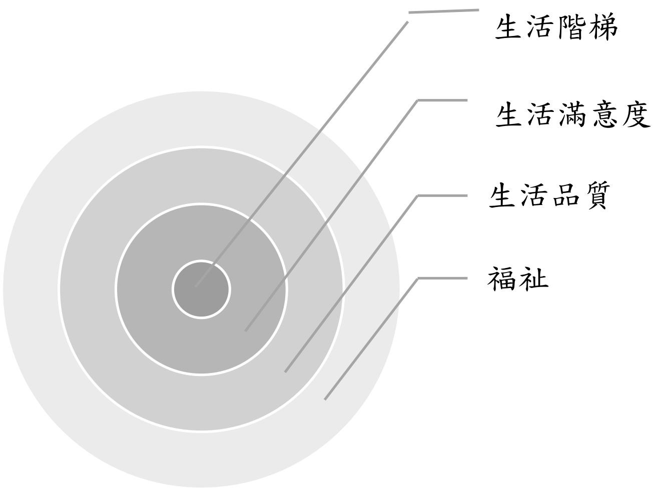

圖 2-1　與「幸福」相似名詞的概念廣度整理

資料來源：吳書榆（譯）（2013）。**幸福經濟學：幸福是滿足過生活？還是人生有目標？全美最具影響力智庫的關鍵報告**（原作者：Carol Graham）。臺北市：漫遊者。（原著出版年：2010）

貳、 幸福感指標衡量

幸福是每個人終生欲追求的目標，而幸福感係指個人的主觀經驗感受，夾雜認知與情感兩個面向對生活進行評估（彭錦鵬、李俊達，2014）。在研究領域中，幸福可分成兩種衡量指標，其一為客觀幸福感，指的是放之四海皆準的衡量標準，通常會反映在物質生活裡每個人的感受上（余民寧，2015）。其二為主觀幸福感，指自身對生活的整體主觀覺知與評鑑狀態，然而因每一個人對幸福定義的不同，感受的幸福程度也會不同。以下分為主觀幸福感與客觀幸福感指標兩面向說明。

一、主觀幸福感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一種後設的結構，包含個人對其生活經驗之回應的評價（Okun, Stock, Haring & Witter, 1984）。幸福感是個人主觀經驗，是由正面情緒、負面情緒與生活滿意度三個部分所組成（Andrews & Withey, 1976）。美國心理學家 Diener 認為幸福感包括生活滿意度、重要領域（工作、休閒等）的

滿意度、正向情感、低標準之負面情感（Diener, 2000）。學者更進一步說明，幸福感除了有愉悅的生活(Pleasure life)外，還包含積極投入的生活(Engaged Life)、有意義的生活（Meaningful Life），意即知道自己的長處，然後利用它們來實現自己的信念並為自己所相信的事物所努力（Seligman et al, 2009）。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明幸福感兼具涵蓋主觀的個人正負向情緒、客觀的社會整體生活條件，並且是以跨時間長久狀態而定的表現。

起初西方幸福感量表多針對個人背景特徵或個人特質編制，1969 年國外學者 Bradburn 提出情感量表，評估正、負面情感進而推斷幸福感，其後學者陸續編制相關情感量表、整體幸福狀況量表、牛津幸福量表(Argyle & Crossland, 1987)、正向與負向情感量表…，後續更增加其他個人層面的情緒字詞，如害怕(fear)、罪惡（guilt)、滿意（contentment)、自豪（pride）等辭彙。以文化價值面切入，考量西方國家個人主義意識強烈，於西方施測穩健性的指標恐無法一體適用在儒家社會之中。隨近年關於跨文化的幸福感研究興起。對於集體主義社會取向的國家，其幸福感來源除了「個我」層次的滿足、愉悅、掌握、成就之外，可能具有「社我」層次的人際和諧特性（陸洛，1998)。簡明來說，在儒家社會文化下，人所追求的幸福不單為個人幸福，而是某群體的幸福，也因此家庭滿意度成了影響個人幸福感的重要因子。台灣學者陸洛於 1998 年研擬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使用牛津幸福量表 28 題中的衡量向度外更增列了 20 條適用中國人之向度，像是和諧的親友關係、社會承諾、他人讚賞、工作成就等等…。此量表題目施測結果相關係數達 0.94，再者檢驗 Alpha 的內部一致性達 0.95、再測信度 0.66(Lu & Shih, 1997)。整體來說，此份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本身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相當不錯。然而此份問卷的問世，開始讓學界有了關於幸福感的新視角與研究貢獻。在影響幸福感因素中把個體主觀感受與文化因素納入考量。依據個體判斷幸福的標準為內在檢驗，如態度、信仰、情緒等，另有外在過程，像是規範、角色和別人的期望等所表現的行為（陳有真、賈志永與羅亞林，2010)。

二、客觀幸福指標

客觀幸福感（Objective well-being）的概念與生活滿意度、生活品質相似。通常代表個人生活的理想與不理想程度，且多強調外部因素（Diener, 2006），與主觀幸福感不同在於，大部分描述個人對生活環境的整體評價，而非對生活環境的反應與認知。也因此客觀幸福感常用來評估國家綜合競爭力指標。起初不丹國家首先推出「國民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鑒於經濟指數並不能全然代表人民福祉與國家競爭力，其後 2011 年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建構全球第一個跨國性的幸福指標，提出「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架構（OECD, 2011）。OECD 更於 2013 年提出「衡量主觀幸福感指導手冊」進一步描述主觀幸福感的定義為：「良好的心理狀態，包括人們對自己生活的各種正向和負向的評價，以及人們對自己的經歷所產生的情感反應。」(董曉翠，2014)。然而我國國民幸福指數遵循 OECD「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架構，採用相同指標區分物質生活條件及生活品質兩大面向，物質生活條件像是居住條件、所得與財富、工作與收入，而生活品質包含社會聯繫、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健康狀況、主觀幸福感、人生安全、工作與生活平衡…共 11 個領域（行政院主計處，2014）。此外，也有學者使用貧窮門檻（poverty threshold）概念，又稱貧窮線或貧困線，即滿足生活所需的最低生活收入水平，作為客觀幸福的指標之一（余民寧，2015）。故相較於主觀幸福感，客觀幸福指數中物質生活條件，較能與世界各項指標評比和排名（彭錦鵬、黃東益，2012）。

綜合上述，主觀幸福感因每個人的經歷、內心感受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生活狀態與幸福認知；相對的，在客觀幸福指標中綜合多方生活環境狀態，評估每個人的生活狀態，進而影響個人幸福感。過往研究指出，主觀心理指標與幸福感的關係高於客觀指標與幸福感之間的相關（陸洛，1998）。行政院主計總處也曾針對「主觀幸福感」的指標說明，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具比較性，與他人比較的相

對優劣，或與自己過去經歷、未來預期、實際的或期望的狀態比較，均影響幸福感的自評結果（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儘管客觀環境會影響幸福感受，但基於不同個體、文化情境於生活經驗上的經驗，幸福感依然奠基在個人自身感受，主觀幸福感確實扮演了美好生活的重要角色。也因此在本研究設計中，考量幸福感應為個人對生活的綜合感受，故採以單一題了解受訪者對整體的幸福感。

參、 幸福感相關研究

現今幸福感的相關研究中，大致分為兩大面向，其一為研擬世界與各國幸福指標，涵蓋社會、環境、財政統計等綜合面向，強調客觀幸福指標，便於國家間各項指標評比與排名。其二，除著眼客觀衡量幸福感指標外，更多研究聚焦在影響幸福感因素上。此幸福感衡量方式廣泛、多元，其中最常見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如性別、族裔、年齡、收入、教育和婚姻狀況（Hira & Mugenda, 1999b），另有研究指出人際關係的和諧、社會連繫、虔誠的宗教信仰等社會支持可以滿足個體的基本需求，提升個體的心理健康與幸福感，使其有能量去因應身邊環境變化，進而產生幸福感（Bolger & Amarel, 2007）。

理財相關議題也與幸福感有關，因此亦有相關研究從理財角度切入，如金錢態度（Nickerson, Schwarz, & Diener, 2007）、財務壓力（Drentea & Lavrakas, 2000）與理財福祉相關。關於理財行為與理財知識的研究更為多數，在理財行為上，良好的理財行為，包括現金管理、信貸管理和儲蓄方面的做法與總體福祉有正相關關係（Xiao et al., 2007），針對大學生的實證研究效果更為顯著（Shim et al., 2009; Worthy, Jonkman & Pike, 2010）。針對理財行為上往前探討理財素養的議題，理財素養也會影響理財福利，因個人的理財知識和態度決定個人的理財行為（Perry & Morris, 2005; Shim et al., 2009; Britt, Cumbie & Bell, 2013; Lusardi & Mitchell, 2014）。鑒於過往的實證研究，故本研究欲探討關於中國居民在理財知識、態度、信用卡使用行為與幸福感之關係。

第二節 負債與信用卡相關研究

壹、 負債定義與種類

負債（Liabilities）以會計學角度解釋，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中定義負債為「企業因過去事件所產生之現時義務（present obligation），而清償該義務將會造成企業資源（即經濟效益）的流出。」企業中常使用的負債，按照時間償還又可分為長期、流動負債。然而在家庭負債中，依照負債用途，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的問卷題目，大致可分為消費負債與投資負債兩類。消費負債包含第一套房產負債、汽車負債或信用卡負債；投資負債像是包含農業、工商業負債、教育負債或金融產品負債等等…。然而在進行家庭負債融資渠道時，可使用銀行借貸或是民間借貸。

在銀行貸款中，有財產抵押或是非財產抵押兩種形式。財產抵押是以一定價值的物品作為保證向銀行或第三方信用換取貸款，一旦在約定期限內債務得到清還，財產所有權便可還給原先債務人，然而按擔保的不同，又可分為抵押貸款、質押貸款。一般常見於銀行貸款，銀行通常會要求借貸人需具備良好的信用評等、制定良好的還款計畫或是以土地、房屋等不動產作為抵押物，透過直接、間接方式向銀行借錢，其利率通常在 2～8%不等。然而另一種非財產抵押，意即以保證貸款和信用貸款等方式。保證貸款的保證方式以第三人承諾在借款人不能償還貸款本息時，按規定承擔連帶責任而發放的貸款。而信用貸款則不需要有資產抵押給銀行或貸款公司，主要是評估客戶信譽批核。償還機制較不同的是，信用借貸採取循環借貸，一旦沒有準時繳清帳款，銀行自然就有權針對債務收取利息與相關違約金，將該期間尚未償還款項以循環利率計算，持續累積、再度計息。根據我國銀行法第 47-1 條，信用卡之循環信用利率不得超過年利率百分之十五。相較前者借貸工具，信用借貸酌收利息相對較高。

表 2-2-1

不同抵押形式介紹

名詞	抵押	質押	保證	信用
保證方式	不移轉占有	移轉占有	第三人承諾	個人信譽
辦理方式	以抵押物折價或以拍賣、變賣該抵押物的所得價款受償，亦或是法院提起訴訟	與提出質押人協議以質物折價或依法拍賣、變賣質物清償債權	保證人承擔連帶責任而發放的貸款與民事責任	一旦沒有準時繳清帳款，採取循環借貸，持續累積計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 信用卡定義與相關研究

根據我國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二條說明，信用卡是指持卡人憑發卡機構之信用，向特約之人取得商品、服務、金錢或其他利益，而得延後或依其他約定方式清償帳款所使用之支付工具。意即持卡人可使用信用卡作為支付工具，可選擇分期性付清現金，甚至是預借現金，因此信用卡可視為一種消費與借貸兩個基本為一體的商品。只要與銀行或機構約定期限內付款便不必收取利息，如逾期不付，會以利率高於銀行的借貸利息計算，其償還利率約接近法定利息接近 15% 左右的高利率水準。也因歷經 2007 年的雙卡風暴高峰後，使銀行、發卡機構雙卡逾放比率提高，意即超過一定期限未正常繳納本息的放款占總放款的比率增加。因此金融監督管理委員和銀行公會提出改善的措施，銀行雙卡逾放比一旦超過 2.5%，停發新卡。金融機構也建立審核機制，評估信用風險。對不同信用條件的客戶，提供不同利率，實施差別利率（黃明聖，2015）。然而在中國，狹義的信用卡專指貸記卡，事先消費後付款，將支付和信貸為一體的形式（張瀚文、杜秋實，2010）。持卡人用卡須先按發卡行要求繳存一定金額的備用金。當備用

金餘額不足以支付時，方可在發卡行規定的信用額度內透支。

現今已有不少信用卡相關研究，因信用卡本身牽涉不僅侷限經濟領域，更具備社會意涵。其中相關研究以企業管理與行銷的角度切入為大宗，如分析發卡機構的經營策略，提出方法提高機構的信用卡業務指標、競爭力與改善逾期放款策略…等，進行機構診斷。其次在信用卡行銷策略研究，多以消費者的持卡與用卡動機為變數，進而探討使用信用卡行為、選擇和重視的信用卡功能等等，說明行銷對不同客戶族群發揮的精準效果。然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與行銷研究相似之處，著重解釋持卡人個人特質與背景特徵，如人格特質、信用態度、刷卡狀況、學歷、收入…等。另外，根據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2011 年中國城鎮家庭微觀調查研究顯示，戶主學歷、家庭淨財富和收入與居民信用卡使用顯著正相關，而戶主年齡與信用卡使用顯著負相關。因此在社會科學中，進一步以心理學、社會學的角度探討與解釋人的行為與動機（吳衛星、吳錕、王璡，2018）。

針對不同研究需求與性質，衡量信用卡行為的指標有所異同。如衡量負向信用卡行為，選擇以欠款金額表示（Shim et al., 2009）；如衡量使用信用卡動機，以使用動機與用途表示（Jennifer ＆ Claudia, 2017）；另如欲衡量信用卡使用狀況，操作性指標可選擇使用信用卡行為相關之頻率、拖欠繳費、逾期還款等（Delafrooz ＆ Paim, 2015），或以持有信用卡張數、有無使用信用卡表示。然而本研究採用中國居民信用卡欠款餘額，衡量其信用卡使用行為，並進一步說明行為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及分析預測機率與邊際效應。

參、中國信用卡、理財教育現況

一、中國信用卡市場發展

根據《2019 年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報告指出，截至 2019 年末，信用卡和借貸合一卡在用發卡數量共計 7.46 億張，同比增長 8.78%。其中，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貸合一卡 0.53 張。在信用卡欠款餘額中，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 742.66 億元，欠款餘額約占 1%的應償信貸餘額（中國政府網，2020）。

然而過往在中國信用卡市場中，其主要發展共歷經三個時期，分別為歷經拓荒、跑馬圈地及精耕細作期。起初於拓荒期（1985～2002 年），於 1985 年發行中國珠海首張信用卡，當時整體行業參與者少，且絕大部分信用卡屬準貸記卡，意持卡人須先按照發卡行要求繳存一定的準備金，當備用金額不足時，方可在發卡行規定的信用額度內透支（黎子文，2015）。至 1999 年中國《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的頒布，中國各家銀行開始積極探索發行真正的信用卡－借貸卡（杜蕾、胡少華，2004）。並在當時，中國財政部頒布關於信用卡呆帳、壞帳和其他損失核銷的暫行規定，有效減少銀行發卡的後顧之憂。其二，在跑馬圈地時期（2003～2008 年），2003 年前後各家銀行開始出現信用卡業務專營部門，以及初步發展個人徵信系統。然而自 2002 年末至 2008 年信用卡發卡量，從不足 3000 萬張飆升至 14229 萬張爆發式的成長（謝俊寧，2018），期間累積發卡量增速達 36.5%。後因電子商務的興起，促使信用卡逐漸朝網路發卡發展，且隨市場需求推出各式市場品牌信用卡商品。自 2009 至 2014 年，信用卡累計發卡量增速分別為 30%、24％、24％、16％、18. 2%、17.9%，逐步下降並趨於平穩。2008 年至 2014 年，信用卡貸款餘額增速分別為 111%、55%、84%、81%、40%、61.6%、27.2%，呈現高速增長（黎子文，2015）。意即行業重心開始從追求數量轉往向追求質量，逐漸朝向多元品牌活動，擴大信用卡業務，故將此時段稱作精耕細作期（2009 年至今）。

二、中國理財教育現況

相對於美英兩國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發展快速的國家，在推動理財教育上起步甚早，實屬走在眾多國家前列。而中國推進理財教育的時間較晚。於中國理財知識普及教育體系與國家策略，中國人民銀行於 2013 年會同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一行三會）規劃制定《中國金融教育國家戰略》文件，作為理財教育國家策略，並提交 G20 和 OECD，納入其編撰的各國理財教育國家戰略報告中（曾永清，2019）。然而針對中國目前理財教育現況仍有幾點待完善之處。首先，中國目前尚未建立專職理財教育普及的教育組織體系，另外在國家層級中也尚未真正有相關法律規範，故難有訂定理財教育普及計畫的短、中；長期目標。反觀美國於 2003 年成立理財素養與教育委員會（Financia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Commission, FLEC），致力推廣美國人的理財素養與理財教育，並結合多個聯邦政府機構一起執行（曾永清，2019），其中以非營利組織－個人理財素養聯盟（Jump$tart），推廣理財教育課程最為出名。而英國則是委託貨幣諮詢組織（Money Advice Service, MAS）負責開展消費者相關教育工作。接續英國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成立理財能力指導委員會，專門負責國民理財知識普及的總體規劃。

再者，在宣傳理財教育的對象與手段相較單一，普及方式多為「廣撒網」式的宣傳普及和「公益＋產品營銷推介」，針對民眾由下而上的主動需求性較低（黃錦寧、韋荷琳，2019），宣傳較流於一體化形式，有別美英兩國針對不同學齡階段制定理財教育目標。再者因中國幅員廣大，金融機構在不同地區的設點密集度不一，另外也因人力、財力等資源約束，故在民眾的理財教育中呈現「城鎮熱，農村冷」。2016 年中國人民銀行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金融國際網絡，其中合作調查也證實，農村消費者的理財知識水平低於城鎮居民（白鶴祥，2017）。然而中國國務院也已於 2015 年發佈《關於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及關於普惠金融等相關推動要求，重視金融消費者需求的多元性與差異性，積

極支持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群體等獲得必要、及時的基本金融產品和服務（國務院辦公廳，2015）。

最後針對評估機制上，針對宣傳效果上的評估關注度較低，難確實接收中國當局理財推廣成效。加上缺乏全面性定期的國民理財素養調查機制，金融管理部門中與教育機構間的連結性不強，故難真正將計畫落地套用在實際場域。另外在教學效果評估上機制不足。未建立一套科學全面的教育效果評估機制，對效果的評估往往只注重一些表面的數據資料，還缺乏全面有效的調查研究。

第三節 信用卡與幸福感的關係研究

目前針對幸福感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國大陸自 2013 年以來已發表近 40 篇從個人或家庭收入、資產配置行為角度探討，近年開始探討特定負債狀況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資料庫 2011 年與 2013 年的縱向研究發現，家庭負債每增加 1 倍，家庭變得幸福的概率將減少 0.05（李江一等人，2015）。經濟生活水平除了來自家庭或個人的資產配置行為外，更可能因受到負債的影響，進而影響居民的幸福感。然而在這當中還存在一些關鍵因素，例如債務水平、債務來源和整體財務資源（Tay, Batz, Parrigon & Kuykendall, 2017）。然而也有研究指出說明房屋資產本身能顯著提升幸福感，但房屋負債會部分抵銷房產增值帶來的幸福感（李江一等人，2015）。針對不同消費類型負債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也有所差異，其中以房屋負債、工商業負債影響幸福感最為顯著（劉宏、明瀚翔、趙陽，2013；李江一等人，2015）。研究發現客觀負債數值影響幸福感效果不一，故納入行為人的心理、認知感受作為其中的傳導途徑。以下根據過往的實證研究，說明透過消費、健康兩種行為途徑，負債對幸福感產生正負向的不同效應。

首先在消費途徑中，根據流動性約束理論，當居民面對流動性約束時可透過借貸滿足當前消費，從而提高當前經濟生活滿意度，進而增加幸福感（李江一等人，2015）。然而在中國實證研究上也有相關研究證實短期負債促進消費的結果（黃興海，2004；韓立岩、杜春，2011）。近幾年家庭負債的增長事實都正同

Friedman 提出「恆常所得假說」，意即人們偏好讓自己的消費「平滑」，像是透過借貸讓每個時間點上的消費支出差異縮小。另因信用卡的使用率與商品性質，能讓家庭能夠實現消費平滑，從而促進消費的增長（Mian & Sufi, 2010）。相較特別的是，如放在經濟不穩定時期使用信貸支援生活方式或在生命週期內平穩消費，可能會使家庭幸福感下降（Hunter & Heath, 2017）。

其次，債務人或家庭因心理和身體健康降低幸福感。多國實證研究發現負債對負向情緒有正向相關。除償還壓力影響心理健康，進而影響幸福感之外，另個負向途徑為影響健康狀態。其中一旦過度負債會增加家庭還款能力、損害居民健康（Clayton, Jose & Wilson, 2015）。借款人透過生活的節儉以達快速還款的目的，進而造成身體抵抗差，得病機率上升（Balmer, Buck & Walker, 2006），間接影響幸福感。在控制受訪人配偶健康的情況下，得出負債影響家庭成員是降低幸福感的途徑之一（李江一等人，2015）。相關研究如下表所示：

表 2-3-1

各國債務與負向情緒、幸福感之實證結果摘要

研究者	國家	樣本	結果	主要發現
Krause et al. (1991)	美國和日本 橫斷面	1523美國公民與1517日本公民	債務壓力與負向情緒呈正相關	債務壓力導致負面影響（抑鬱症狀）的增加。
Adams & Moore(2007)	美國 橫斷面	40209名學生	負債與負向情緒呈正相關	客觀債務（信用卡債務）與負面影響（抑鬱，疲憊，悲傷）正相關

（續下頁）

研究者	國家	樣本	結果	主要發現
Drentea & Reynolds(2012)	美國 橫斷面	1463 位 成人	負債與負向情緒呈正相關，債務壓力相反	客觀債務（債務人狀態，而非信用卡債務）與負面影響（抑鬱，焦慮和憤怒）正相關。 債務壓力解釋了客觀債務與負面影響（抑鬱，焦慮和憤怒）之間的關係，表明客觀債務與負面影響之間的關係主要是由於主觀債務。
Archuleta et al.(2013)	美國 橫斷面	180 名 學生	負債與負向情緒呈正相關	客觀債務（學生貸款、信用卡、汽車貸款和分期貸款）與負面影響（財務焦慮）呈正相關
Brown et al. (2005)	英國 超過 5 年追蹤	2193 位 成人	與未償還的非抵押信貸負相關 /與抵押貸款無顯著	客觀債務（未償還的非抵押信貸）對主觀幸福感(正面和負面影響與其他健康指標的組合)具有負面影響；客觀債務（抵押貸款）與主觀幸福感沒有顯著關係(正面和負面影響以及其他健康指標的綜合)，而這些影響在 5 年內保持穩定
Balmer et al. (2006)	英格蘭和威爾士	5,611 名成年人	健康與負債呈正相關	長期生病或殘疾是客觀債務(醫療負債)的強預測因素，長期生病或殘障的受訪者也更容易受到（長期）客觀債務的影響。
李江一、李涵、甘犁（2015）	中國 橫斷面	6848 個 家庭樣本	整體負相關 /部分負債顯著	客觀負債的增加會顯著降低幸福感，其中不同負債對幸福感的影響大小與顯著性不同。負債中又以住房負債、工商業負債的影響為主。

資料來源：修改自 Tay, L., Batz, C., Parrigon, S., & Kuykendall, L. (2017). Deb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other side of the income-happiness coi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18(3)*, 903–937.與筆者自行整理。

現金借貸管道十分多元，包含銀行信貸、動產抵押貸款甚至是民間借款…。然而隨著金融科技變遷，消費支付的形式不再只侷限現金，更可以透過塑膠貨幣進行交易。信用卡（Credit Card）是一個兼具多功能的金融支付媒介，本身具備簽帳消費、預借現金延後支付、循環信用等功能。而信用卡支付能夠使人產生收入幻覺，緩解支付痛楚，驅使持卡人消費欲望膨脹，進而降低幸福感。因消費者特定的心理框架容易相信累積信用卡債務是推遲付款和獲取貨物的有用方式（Akerlof & Shiller, 2009）。因此當人們注重消費，在思考和規劃中缺乏辨別力或長遠視角，從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損害他們的幸福（Frey & Stutzer, 2007）。然而關於信用卡使用影響幸福感的實證研究中，在行為動機之異質性說明上分成兩項途徑影響，其一為方便消費；其二為延遲付款。以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實證指出，信用卡支付顯著降低持卡人的主觀幸福感，由欲望膨脹與消費實現機制導致信用卡支付者的幸福感下降 0.033 個單位（傅聯英，2018）。其中也有研究探討不同家庭使用金錢的影響模式，在信用卡使用行為中負責任的家庭，具備財務管理行為（緊急資金 emergency fund）的情況下，與情緒幸福感（emotional well-being）具正向關係；其中有使用風險信貸行為的家庭，其情緒和財務狀況會降低幸福感（Hunter et al, 2017）。然而考量社會環境因素後，研究指出於經濟衰退期間，收入水準和負責任的財務管理與家庭財務福利水準較高密切相關（Hunter et al, 2017）。而以循環負債者，以滾雪球式產生利息使持卡人陷入債務陷阱，其負債顯著負向影響幸福感（傅聯英，2018）。然而在年紀的分層研究中，也有相同的研究結果，針對 65 歲以上的俄克拉荷馬人整體的心理健康狀況為正向，但其中因財務壓力的人多面臨一些負面結果（Pierre & Shreffler, 2013）。故本研究欲聚焦中國居民信用卡使用行為，如信用卡欠款餘額與幸福感間的關係探討。

第四節 背景因素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影響幸福感之因素，包含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與加入共產黨員等人口特徵對幸福感產生影響。過往研究除針對背景層面外，更加入社經變項、身心健康、以及社會心理因素對於幸福感的影響。其中研究發現女性、已婚者、社經地位較高、以及年長者的幸福感較高（Rampichini & Andrea,1998）。以下針對關係歸屬、人口特徵與經濟收入及資產三個層面，回顧過往實證研究中影響幸福感的結果：

壹、 關係歸屬

「關係歸屬」指涉的是社群對個人幸福的影響，具備個人關係和社會關係，如東方的家庭觀念與西方的社交網絡，都是以「群」為基礎概念建立（彭錦鵬等人，2012）。因社會支持可以滿足個體的基本需求，提升個體的心理健康與幸福感，使其有能量去因應身邊的環境變化，進而產生幸福感（Bolger & Amarel, 2007）。然而現行國際所提的幸福指標中，像是英國的平等衡量架構與台灣競爭力論壇中，皆納入政治影響力的面向（彭錦鵬等人，2012）。然而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中國以共產黨員人數從 1978 年佔全國人口 3.8%至 2018 年 12 月，已擁有了 9059.4 萬名黨員，儼然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政治組織。然而中國城市的調查資料顯示，黨員身份和政治參與度均能提升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宋麗娜、西蒙·阿爾普頓、肖輝，2014）。

貳、 人口特徵

一、 年齡

目前年齡對幸福感的相關研究至今仍無一致的結論。過去研究指出隨年齡增長與幸福感呈負相關（Lu & Argyle, 1991）。另有研究證實正負向情感會隨年齡的增加而上升（Headey & Wearing, 1989）。後續研究指出，年齡對理財福祉有負面影響，但是非線性的。選取年齡與年齡平方變量衡量，結果顯示該效果呈 U 形，即在年輕和老年階段，幸福水準較高，而落在中間年齡階段，幸福感最低（Hayo & Seifert，2003；榮方，2016；高順岳，2017）。可能因素在於青壯年正處於事業巔峰期，面臨經濟責任與壓力較大。故以單一線性的觀點來探討年齡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似乎不足以呈現其中微妙的關係（陸洛，1998）。因此針對不同年齡層對幸福感的關係仍需待實證結果解釋。

二、 性別

關於性別對幸福感的相關研究仍未有一致的研究結論。過往實證研究中指出女性幸福感大於男性（Argyle, 1987; Argyle et al., 1990; Rim, 1993）。因男女性所乘載的性別角色與社會分工上有明顯區分。多半女性須擔任情感水準高的工作，使女性較男性更易體驗和表達情緒的反應（Wood, Rholes, & Whelan, 1989）。此外，如加入不同的文化視角，認為女性是家庭核心而收授的社會支持多於男性，因此女性的幸福感高於男性（陸洛，1998）。另也有研究指出男性較女性更能感受主觀幸福感，並達顯著（彭錦鵬等人，2014）。在文獻回顧中可以發現，性別並非單一影響幸福感的條件，其中更夾雜不同社會狀態的因素。當加入婚姻狀態考量，已婚者中以女性幸福感高於男性（Wood et al.,1989），其中以女性而言，家庭滿意是預測幸福感的有利因子（陸洛，1998）。考量年齡因素，高齡女性的幸福感高於男性（Rim,1993）。

另考量家庭有無兄弟姊妹因素，發現男性兄弟姊妹越多，其幸福感越低；女性則為相反結果，兄弟姊妹越多，其幸福感越高（Furnham & Brewin, 1990）。另外如考量職業婦女與家庭主婦在幸福感上表現，其一認為外出從事有酬工作的職業婦女雖可從工作上帶來資源，但不能減輕婦女面對工作和衝突的壓力，因而職業婦女較不快樂。其二認為可透過個人賺取薪資獲得家庭中權力資源，進而提高職業婦女的家中地位，由工作帶來的福祉高。另方面在家庭主婦中，恐缺乏社會脈絡、經濟依賴性高，其幸福感與整體生活福祉相較職業婦女來的低。綜觀以上研究，說明性別對幸福感時，仍須留意不同因素交織作用所帶來的影響。然而近期也有研究指出，性別對主觀幸福感之間並無存在差異性（Kahneman & Krueger, 2006）。隨女性逐漸走出家庭，意味著女性的經濟角色以及勞動市場的性別分工改變了。當女性與男性同樣的競爭環境，兩性在情緒上變得模糊不清（彭錦鵬等人，2014）。

三、 教育程度

依教育水準而異，財務上成熟的人往往受教育程度最高（Lusardi et al., 2014）。且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的父母擁有股票和退休儲蓄，比起父母不富裕且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女性，高出約 50 個百分點（Lusardi et al., 2009）。另有研究針對紐西蘭成年人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教育水平與識字技能之間及收入與識字技能之間兩者有很強的聯繫，且受教育程度與紐西蘭人對其身體健康的評估呈正相關，但收入、識字率與幸福感無關（Education Counts, 2007）。從上述可知，教育程度與收入、身體健康有關連性，但與幸福感的關聯性並不強烈。

四、 有無上過理財課程

因隨著理財環境複雜，若沒有基礎或專業的理財知識，會較難適應整體金融環境。過往研究顯示，針對美國幼兒園小孩的財經課程確實有助於提高他們相關的財經概念（Kourilsky, 1977）。此結果與義大利研究實證相符，針

對 58 位三年級生學生，實施 20 小時理財課程後發現，學生在金融制度方面的重要觀念上，實驗組高於控制組（Berti Monaci, 2011）。國內研究也發現，曾經學習理財的七年級學生在施行情境式理財教學後有較佳成績（曾永清、李麗香，2012）。另外利用理財課程討論探討大學生理財態度與行為，發現課程能增加學生理財知識，並提高債信的負責態度（Borden, Lee & Serido, 2008）。以上研究均支持不同年齡段在學習理財課程上的成效。

五、 健康狀況

此研究多出現在醫療、老人照護相關的文獻之中，其衡量內容包含主觀和客觀健康狀況，主觀包含像是自評健康狀況，而客觀狀態如受慢性病數、日常生活活動 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或運動頻率…等。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1947 年的定義「健康是指個人在生理、心理及社會適應三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種狀態，而不僅指沒有生病或者體質健壯。」從中可知道現今社會，逐漸朝積極的觀點看待健康（WHO, 1947，轉引自劉立凡，2010，頁 4-5）。然而同第三節內容提及信用卡影響幸福感相關研究中，研究發現訪談者的經濟壓力與心理健康具負相關（Mills, Grasmick, Morgan & Wenk, 1992），健康程度可能間接影響幸福感。另外英國家庭小組研究也指出，擁有非抵押信貸且債務金額較高會使心理狀況變差，負債可能透過健康降低幸福感（Balmer et al., 2006）。然而台灣國內 2015 年根據行政院內政部，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以下簡稱調研中心）研究發現 2015、2016 年，台灣人民生活滿意度與健康狀況皆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此結果與歐盟的研究調查相同，影響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因素中，以健康狀況最為重要（Eurostat, 2015）。

參、 經濟收入及資產

自幸福經濟學（Happiness Economics）被學者提出後，收入影響幸福感之議題不斷被議論，如 Easterlin 悖論（Easterlin paradox）所示：「幸福感是否會隨著 GDP 上升而增加？」。Easterlin 介紹了 29 個國家的貧富之間的幸福差異，他認為富人始終比窮人幸福（Easterlin, 1974）。然而經濟增長和幸福感增長往往並存，但對於某部分國家在某些時期經歷經濟增長卻沒有增加幸福感。整理過往收入與幸福感相關的跨國研究發現，在 1980~1990 年中，第一世界國家的幸福感與收入之間的相關性有所下降（Veenhoven, 1984）。另在富裕國家中人民幸福感雖高於各國平均之上，但隨收入的增長並沒有使主觀幸福感提升（Diener, 2000）。以日本進行時間追蹤實證，在 1958~1987 年歷經輝煌的經濟時期，平均生活滿意度仍然保持不變增長（Easterlin & Angelescu, 2007）。結果與 Easterlin 認為幸福是相對論點相符，恐受到財富受收益遞減規律的約束。在美國實證研究中，針對年滿 18 歲的社會大眾，研究發現收入為影響生活福祉的重要因素，不同收入對幸福感確實存在顯著差異（Frey & Stutzer, 2000; Tella, MacCulloch, & Oswald, 2001），且高收入者的主觀幸福感高於低收入者（Campbell, 1976），所得與生活福祉兩者具有顯著正向相關（Campbell, 1981；陳密桃、陳玲婉，2005），且在台灣實證資料中研究結果亦同（Tsou, Liu, 2001）。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在貧窮國家中，個人收入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性更加強烈（Veenhoven, 1991; Hayo & Seifert, 2003）。另以收入作為不同群體研究中，發現高收入群體的主體幸福感較高，表示不同收入群體對主觀幸福感實屬有差異（Tella, MacCulloch, & Oswald, 2001）。也有相關研究指出受訪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情感和收入的相關性低，且在年收入為 7 萬 5 千美元達到高峰後逐漸減弱（Kahneman & Deaton, 2010）。但其中特別的是，在同個國家當中跨時期實證發現，美國在近幾十年人均 GDP 增加，但是生活滿意度在同一時期持平（Blanchflower & Oswald, 2000）。

針對個體面向，研究發現訪談者的經濟壓力與心理健康具負相關（Mills et al., 1992）。然而也有研究針對個人心理層面探討，當經濟允許的情況下，多的物質選擇性與快樂、樂觀、自尊及生活滿意之間呈現負相關，卻與沮喪、完美主義和後悔之間呈現正相關（Schwartz, Ward, Monterosso, Lyubomirsky, White & Lehman, 2002）。因此綜合上述實證研究，經濟雖然可以滿足人類基本需求，進而增加幸福感，但當生活達基本需求甚至成為經濟收入達平均中上值時，繼續追求財富卻未必能創造幸福。也因此關於經濟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無必然關係，背後更可能與個體層面的生活模式、心理狀態有關。

在資產（Asset）部分，相較前者的家戶可支配所得，資產屬於金錢的一種存量。不同類型的資產影響幸福的途徑也不同，針對固定資產，如房屋、車子、耐用品等...，消費需求上的滿足可提高效用，進而提高幸福感（李江一等人，2015）。然而在可抵押或金融資產上，可透過緩解流動性開銷而促進消費提升幸福感。另有研究以心理學視角探討資產對幸福感的影響，針對 2002 年中國住戶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相對收入對中國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有重要影響（Knight, 2009）。說明與周遭人相比出現示範效應，相較高資產規模的家庭具更高的幸福感。

第五節 理財知識、態度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Financial knowledge」一字因音譯關係，目前並無統一用詞，有人稱之為理財知識（曾永清，2013），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稱之為財金知識，亦有稱為金融知識（黃富櫻，2008）。但其內涵皆表示「管理個人或家庭的各種錢財，來獲取最大的財務上的福祉」，因此在著重文意下，本研究皆以「理財」一詞代稱。學者指出提高理財知識水準有助於人們建立和維持財務福祉（Shim et al., 2009），概念同 2012 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對理財素養（Financial Literacy）名詞解釋，提及理財素養涵蓋具備知識、態度、技能面，最後達成提升人類福祉的終極目標，皆意旨資產配置行為與幸福感有著一定程度的關係，其原文定義如下：

> *理財概念和風險的知識與理解，並且在理財情境中運用這些知識和理作出有效決策的技巧、動機與個人的信心，最終提升個人與社會的幸福，並且使個人有能力參與經濟生活。*（PISA, 2012, p.13）

身處在金融資產複雜的時代中，消費者需要足夠的理財知識來處理這些市場的資訊。研究發現大多數消費者缺乏理財知識，無法作出重要理財決策來獲得最佳利益（Braunstein & Welch, 2002）。因此透過理財教育所獲得的理財知識，正向影響參與者的理財管理技巧與債務行為（Haynes, Kiss &Yilmazer, 2008），且往往更具有財務責任（Hilgert, et al., 2003; Joo & Grable, 2004; Monticone, 2010; Robb & Woodyard, 2011），提高債信的負責態度，可改善年青人還款行為，降低住房、汽車與信用卡餘額與拖欠，降低負債壓力（Borden et al., 2008; Brown, Klaauw, Wen & Zafar, 2013）。除此之外，人們所運用理財知識也與社會人口統計學特徵、家庭金融複雜程度密切相關（Lusardi et al., 2010）。研究發現，年輕受訪者的算術能力較差和財務複雜程度低之間有明顯相關（Lusardi & Mitchell, 2007a; Lusardi et al., 2009）。針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研究發現，年輕人及老年人對基本理財概念的了解不足，會嚴重影響了儲蓄，退休計劃，抵押和其他決策（Lusardi & Mitchell,

2007）。然而缺乏理財知識也會出現重大的財政後果，像是缺乏識字能力的人，低估利息複利導致產生過多的債務（Lusardi & Tufano, 2015）。理財教育影響的效果十分長遠，如消費者不具備基本的金融知識，便無法全面及準確收集資訊，一旦做出糟糕的理財決策甚至捲入詐欺，將可能降低人們的幸福感（吳衛星等人，2018），因此理財知識可透過行為進而影響財務福祉（Rao & Barber, 2005; Lyons, 2008; Shim et al., 2009）。

然而除理財知識之外，符應現代社會，更需要有面對當前社會生活的理財態度，個人的理財知識和態度決定個人的理財行為（Perry & Morris, 2005; Britt, et al., 2013; Lusardi & Mitchell, 2014）。國內相關研究指出，在理財態度方面，閱讀財經議題頻率不同的學生其理財素養有顯著差異，越常關注的學生其理財素養更高（曾永清、李麗香，2012；曾永清、呂秋萍，2014）。進一步說明關注程度的差異，透過理財教育課程準實驗研究發現，在理財素養社會化的過程中，父母社經地位與孩子的理財素養無顯著關係，但對於施行理財課程的實驗組學生，在理財知識、技能與素養上，父母與孩子的互動討論程度是主要影響因素。因此在關注理財議題層面上，有助於個人進行理財行為。另外在風險態度也與理財福利相關（Joo and Grable, 2004），如不同的風險容忍度會導致理財決策和結果的差異。這些差異可能導致不同的理財健康水準，進而影響福祉（Joo & Grable, 2004）。其中常見風險態度的衡量標準來自美國《消費者金融調查》問項如「哪一項陳述最接近您儲蓄或投資時願意承擔的財務風險金額？」，意旨了解受訪人願意承擔與預期收益或回報成正比的風險。在本研究 中，問項內容也採用此衡量方式。

考量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十分多元，故除了理財行為外，更考量行為人的外在環境因素。故本研究於背景變項中採用關係歸屬、人口特徵、經濟收入與資產三面向，並進一步探討過往研究在背景變項中，如年齡、性別、收入、教育程度對幸福感未有一致或顯著的影響結果，同時說明其他背景變項是否如過往實證研究結果一致。再者，加入理財知識、態度與風險態度因素，進而說明對幸福感的解釋能力，驗證過往的實證結果在中國情境下是否成立，提供當局施政參考。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探討兩層面，中國居民背景變項影響幸福感與信用卡使用行為，以及信用卡使用行為、理財知識、態度對幸福感的解釋能力，本章節將針對施測流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與研究流程以及資料處理等逐一說明。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步驟共分成五階段，包含選定研究主題擬定研究計畫、文獻探討與訂定修正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資料庫問卷統計分析、撰寫研究結果、修正及完成論文。

圖 3-1 研究流程圖

第二節 研究資料來源與處理

本次採用 2015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資料，旨在收集中國範圍內有關家庭金融的相關資訊，依各省人口規模，採分層比例抽樣方式調查，以便定期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決策提供微觀家庭金融數據。於 2011 年開始進行全國家庭金融調查，2015 年第三次施測時，調查樣本擴大分佈中國 29 個省（市、區），363 個縣，1439 個村（居）委會，有效樣本共 37289 戶，更全面詳細地反映中國家庭金融的狀況（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2020），截至 2017 年已完成第四次全國調查。其中，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內容包括：基本人口統計特徵、主觀態度、金融與非金融資產、負債與信貸、家庭支出與收入、社會保障與保險等相關資訊。

針對 2015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回收資料，該研究單位事前已將所有數據進行初步處理，包括刪除由於訪員嚴重臆答、作弊的無效樣本、刪除無效變數與校正人為導致的重複樣本編號，另外拆分 37289 筆家庭和 133183 筆家庭成員個人數據。基於本研究目的，樣本使用上，保留戶主與受訪者編碼一致樣本，並將漏答幸福感、無使用信用卡之作答的樣本數剔除，最後有效筆數共計 6444 筆。另將受訪者的幸福感、健康狀況、風險態度與理財態度四個有序排列資料重新編碼，數值越大表示程度越高。另在理財知識問項上，採答題總分數；信用卡欠款餘額則以加總不同欠款性質費用之總額表示。

第三節 資料分析與統計模式

本次主要使用以下五項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檢驗，說明如下：

壹、敘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使用人口相關背景特徵、信用卡欠款餘額財務資料與幸福感進行統計說明，了解資料大致的呈現狀況。

貳、T 檢定（T Test）

針對群體進行差異性分析，本研究以 T 檢定分析背景人口特徵中的「性別」、「是否為共產黨員」對於「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是否達顯著差異。

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針對三個以上獨立群體進行差異性分析，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分析背景人口特徵中的「年齡」、「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對於「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是否達顯著差異。

肆、雙因子變異數分析（Two-Way ANOVA）

再者檢驗「性別」、「年齡」對「幸福感」的影響效果，得出主要效果（main effects）和交互效果（interaction effects）。

伍、 次序迴歸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

自評幸福感是由數值 1-5 分所表示，其分別代表「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由於自評幸福感是有次序且有意義的，故採用次序迴歸模型 Ordered Logit Model，診斷信用卡欠債餘額對幸福感影響程度。其中加入所有背景人口特徵、理財知識、理財態度、風險態度及信用卡欠款餘額，觀看對整體幸福感的解釋能力變化狀況。關於關於操作性步驟與問項內容於第四節詳細說明。

第四節 模型設計

壹、 理論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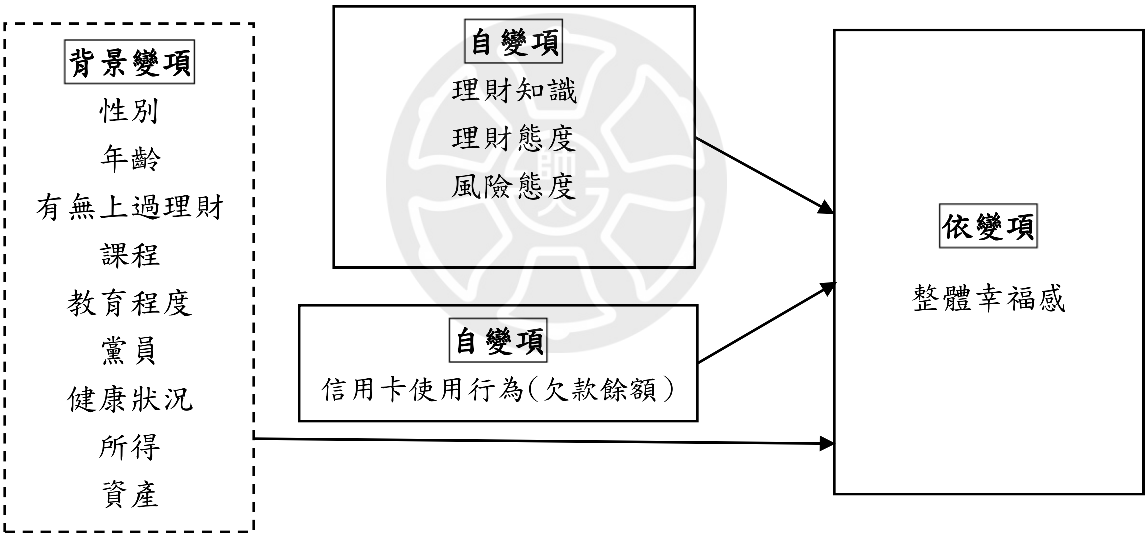

圖 3-2 本研究架構

貳、 迴歸統計模式

以 2015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資料作為分析母體，並導入 stata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使用 Ordered Logit Model 羅吉特迴歸分析模型，應用於次序尺度的依變數，旨在看到依變數被其他解釋變數預測的強度。在此研究中，將進一步說明幸福感的邊際效果與預測機率，並說明性別、是否為共產黨員身分在幸福感表現上的勝算比（odds ratio），意指「兩個機率相除的比值」，

而非多少單純人數或數量為幾倍的風險或是機率。

因傳統迴歸分析中採用連續變數、常態分佈的假設，故在本研究中無法適用，因此決定採用羅吉特迴歸分析，主要在於了解一變數為離散型或次序變數時，兩個或多個以上的變數之間的相互變化關係。而羅吉特迴歸類似迴歸模型，特別之處在於，在此將使用預測統計工具－比例勝算模型（Odds proportional model），並同時說明預期效果與邊際效應。以下說明本次的迴歸模型：

一、*Happiness* 幸福感迴歸方程式

（一）Happiness 如為連續變數：

$$Happiness = \alpha_0 + \alpha_1\, Cre + \sum_{i=1}^{8} \beta_i\, Dem_i + \sum_{i=1}^{3} \gamma_i FL_i + \mu \qquad (1)$$

（二）*Happiness* 幸福感，如為次序變數：

若幸福感為次序量度（ordered scale）由 5 遞減至 1，使用 ordered logit model（OLM）分析。因此，H 值之機率計算（H=m）：

$$\Pr(H_i = m \mid x_i) = F(\tau_m - X_i\alpha) - F(\tau_{m-1} - X_i\alpha) \qquad (2)$$

Xα 為（1）式右邊簡化符號（α 包含 α,β,γ 係數）。將 ***Happiness*** 值分別以 5 到 1 代入估算中。τ_i 為臨界值（threshold），通常設定 τ_i=0，在誤差值 μ 設定為對數分配（logistic distribution）情形下，μ 之平均數為 0，變異數為 $\pi^3/3$，機率密度函數（pdf）為：

$$\psi(\varepsilon) = \frac{\exp(\varepsilon)}{[1+\exp(\varepsilon)]^2}$$

而累積密度機率函數（cdf）為：

$$\psi(\varepsilon) = \frac{\exp(\varepsilon)}{1+\exp(\varepsilon)}$$

二、各自變數代號

1. Happiness：幸福感
2. Cre：信用卡使用行為，為信用卡欠款餘額。
3. Dem：由八個背景人口變項組成，分別表示性別（gender）、年齡（agegroup）、教育（edu）、有無上過理財課程（session）、共產黨員（communist）、健康（health）、收入（income）、資產（asset）。
4. FL：由三個變項組成，分別表示理財知識（FK）、理財態度（FA）、風險態度（risk）。
5. $\boldsymbol{\alpha_0}$：常數項；$\boldsymbol{\alpha_1}$、$\boldsymbol{\beta_i}$、$\boldsymbol{\gamma_i}$：係數；$\boldsymbol{\mu}$：誤差項

詳細變數說明詳見下段文字。

參、 變數說明

本研究根據 2015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資料，使用變項主要包含背景變項、自變項與依變項三大部分：

一、背景變項

本研究採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問卷之八個人口背景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有無上過理財課程」、「黨員」、「健康」、「收入」、「資產」、。針對前六項驗證本研究假設一、二。接續再與幸福感個別與交叉檢驗有無顯著差異，及進行後續事後比較。

二、自變項

(一)理財知識、理財態度與風險態度

本研究變項衡量源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問卷問題，在理財知識中的選擇題問項分別為「假設銀行的年利率是 4%，如果把 100 元錢存 1 年定期，1 年後獲得的本金和利息為？」、「假設銀行的年利率是 5%，通貨膨脹率每年是 3%把 100 元錢存銀行一年之後能夠買到的東西將？」如該題受訪者回答正確給予 1 分，如答錯則為 0。最後再將兩題分數加總。另外在理財態度與風險態度皆為單一題型，由受訪者自評個人對理財資訊的關注程度與風險商品的接受程度。

(二)信用卡使用行為

在信用卡欠款餘額的問項中，選用「目前，您家信用卡所欠多少錢？」此題衡量。其中欠款費用包含一般信用透支、逾期未還款、延期付款、分期付款或預借現金，由受訪者自行回答數字。

三、依變項

本研究依變項採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問卷的「整體幸福感」，操作性衡量源自問卷問題「您現在覺得幸福嗎？」。受訪者針對題目於「非常幸福」、「幸福」、「一般」、「不幸福」、「非常不幸福」五個選項中擇一回答。此答題採用次序變數且具意義順序，考量選項之間的差異並不一致，故在本研究中採用 odered logit model，針對連續變數決定觀察到的次序變數，進而得出比例勝算（odds proportion）結果，意即當自變數增加一單位，依變數 Y1 相對依變數 Y2、Y3 的機率，或依變數 Y1、Y2 相對依變數 Y1 的機率會增加幾倍。

針對本研究 變項與操作設計，詳見下方圖表說明：

表 3-4-1

主要變量設定

變項	代號	意涵	操作性測量與編碼說明
背景變項	gender	性別	0 表示女性；1 表示男性
	agegroup	年齡	重新編碼受訪者的出生年，以十年為一區間重新編碼。如：21~30 歲
	edu	教育程度	若教育程度為無上過學，編碼 1；若學歷為小學，編碼為 2；若學歷為初中、高中、中專或職高，編碼 3；若學歷為高職、大專或大學本科，編碼 4；若學歷為研究所以上，則編碼 5。
	session	有無上過理財課程	0 表示無上過理財課程；1 表示有上過理財課程
	communist	共產黨員	0 表示非共產黨員；1 為共產黨員
	health	健康狀況	根據受訪者的主觀評價評定 1~5 分，重新編碼後，將選填「非常健康」、「很健康」編碼為 2；選填「一般」編碼為 1；選填「不健康」、「非常不健康」編碼為 0。
	asset	資產	以數值表示受訪者家庭的總資產。
	income	所得	以數值表示受訪者家庭的總收入。

（續下頁）

變項	代號	意涵	操作性測量與編碼說明
自變項	FK	理財知識	依受訪者選項回覆給予 1 或 0 的分數。最後再進行分數加總。
	FA	理財態度	根據受訪者理財資訊關注程度評定 1~5 分，5 表示非常關注，1 表示從不關注。
	risk	風險態度	根據受訪者對風險商品接受程度評定 1~5 分，5 表示願選擇高風險高報酬之商品，1 表示不願承擔風險商品。並剔除選填 6 不知道的樣本。
自變項	credit	信用卡使用行為	針對受訪者目前家中信用卡欠款餘額，包含免息期內一般信用透支、逾期未還款、預借現金、延期或分期付款等費用總額。
依變項	happiness	幸福感	依據受訪者幸福程度評定 1~5 分，5 分為非常幸福，1 分為非常不幸福。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 採用 SPSS 23.0 版以及 Stata 14 版電腦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本節根據第三章研究架構概述背景變項、自變項、依變項之敘述性分析。以下將以「背景變項敘述統計」、「幸福感、信用卡行為之差異分析」、「相關係數分析」、「次序羅吉特迴歸模型分析」四節內容說明。

第一節　背景變項敘述統計

壹、 背景變項說明

本研究共計 6444 筆樣本資料，針對八項背景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有無上過理財課程」、「是否為共產黨員」、「健康程度」、「收入」、「資產」進行說明。

一、性別

男性共計 3240 人（50.3%）；女性共計 3204 人（49.7%）。本研究樣本的男女性比例相近，男性高於女性 36 人。

二、 年齡

以該研究調查 2015 年的年齡統計，最小年紀 17 歲，最大至 91 歲。2015 年調查 30 歲以下共有 1232 人（19.1%）；31~40 歲共計 1901 人（29.5%）；41~50 歲共計 1681 人（26.1%）；51~60 歲共計 1031 人（16%）；61 歲以上共計 598 人（9.3%）。本研究樣本中，以「31~40 歲」的區間人數最多，「41~50 歲」人數次多。

三、教育程度

無上過學共計 71 人（1.1％）；最高學歷為小學，共計 374 人（5.8％）；最高學歷為初中、高中、中專或職高，共計 2856 人（44.3％）；高職、大專或大學本科，共計 2886 人（44.8％）；研究所以上學歷，共計 260 人（4％）。其中最高學歷以「高職、大專或大學本科」人數最多，「初中、高中、中專或職高」人數次多。

四、有無上過理財課程

上過理財課程，共計 1272 人（19.7％）；未上過理財課程共計 5171 人（80.2％），其中以未上過課程人數最多。

五、共產黨員身分

具有共產黨員身分共有 1597 人（24.8％）；無共產黨員身分共計 4847 人（75.2％）。在本研究 中，以「無共產黨員身分」居多。

六、健康狀況

根據受訪者的主觀評價評定，自評不健康共計 335 人（5.2％）；自評一般共計 2365 人（36.7％）；自評健康共計 3742 人（58.1％）。

七、收入

在 6444 筆資料中，最高收入為 5000000，平均收入為 173312.69 元。

八、資產

最低資產總和 400 元，至最高資產總和 20000000 元，平均資產約 2139741 元。

表 4-1-1

不同背景變項敘述分析

變項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1. 男	3240	50.3
	2. 女	3204	49.7
年齡	1. 30 歲以下	1232	19.1
	2. 31~40 歲	1901	29.5
	3. 41~50 歲	1681	26.1
	4. 51~60 歲	1031	16.0
	5. 61 歲以上	598	9.3
有無上過理財課程	1. 有	1272	19.7
	2. 無	5171	80.2
教育程度	1. 無上過學	71	1.1
	2. 小學	371	5.8
	3. 初中、高中、中專或職高	2856	44.3
	4. 高職、大專或大學本科	2886	44.8
	5. 研究所以上	260	4.0
共產黨員身分	1. 是	1597	24.8
	2. 否	4847	75.2
健康狀況	1. 不健康	335	5.2
	2. 一般	2365	36.7
	3. 健康	3742	58.1

N=6444

註：在「年齡」、「有無上過理財課程」、「健康狀況」中，各有一筆遺漏值

貳、　理財課程、理財知識、理財態度與風險態度說明

以下針對本研究 樣本中的自變項「理財知識」、「理財態度」、「風險態度」進行說明。

一、 理財知識

根據 2015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問卷的兩項理財題目進行重新編碼 0~2 分，整體平均分數為 1 分。分數為兩分的受訪者共計 1146 人（17.8%）；分數為一分的受訪者共計 2384（37%）；分數為零分的受訪者共計 2914 人（45.2%）。其中以分數為「零分」的人數最多，接近一半的樣本數，其次為「一分」的人數。

二、理財態度

根據受訪者理財資訊關注程度評定 1~5 分，平均理財態度為 2.72。自評從不關注人數共計 979 人（15.1%）；自評很少關注共計 1789 人（27.5%）；自評一般關注共計 2392 人（36.8%）；自評很關注共計 894 人（13.8%）；自評非常關注共計 447 人（6.9%）。其中以「一般關注」的人數最多，「很少關注」人數次之。

三、風險態度

根據受訪者對風險商品接受程度評定 1~5 分，平均風險態度為 2.61。自評不願選擇任何風險報酬商品共計 1527 人（23.5%）；自評選擇略低風險報酬商品共計 1406 人（21.6%）；自評選擇平均風險報酬商品共計 2293 人（35.3%）；自評略高風險高報酬商品共計 779 人（12%）；高風險高報酬之商品共計 496 人（7.6%）。其中以「選擇平均風險報酬商品」人數最多，「不願選擇任何風險報酬商品」次之。

表 4-2-1

理財課程、理財知識、理財態度與風險態度敘述分析

變項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理財知識	1. 兩分	1146	17.8
	2. 一分	2384	37.0
	3. 零分	2914	45.2
理財態度	1. 從不關注	971	15.1
	2. 很少關注	1774	27.5
	3. 一般	2368	36.7
	4. 很關注	887	13.8
	5. 非常關注	444	6.9
風險態度	1. 不願選擇任何風險報酬商品	1694	26.3
	2. 選擇略低風險報酬商品	1394	21.6
	3. 選擇平均風險報酬商品	2094	32.5
	4. 選擇略高風險高報酬商品	772	12.0
	5. 選擇高風險高報酬商品	490	7.6

N=6444

參、 信用卡行為說明

本研究 6444 筆樣本中，涵蓋一般免息期內信用透支、預借現金、逾期未還款、延期付款、分期付款的種類中，最小值為 0 元，最大值達 1000000 元，平均信用卡欠款餘額為 3308.11 元，標準差達 23509.445 元。

肆、 幸福感表現

在幸福感的資料調查中，根據受訪者對整體幸福感的主觀評比 1~5 分，在 6444 筆受訪者資料中，平均幸福感為 3.79 分。其中自評非常不幸福共計 33 人（23.5％）；自評不幸福共計 193 人（3％）；自評一般共計 1988 人（30.9％）；自評幸福共計 3122 人（48.4％）；自評非常幸福共計 1108 人（17.2％）。其中自評「幸福」人數最多，「一般幸福」次之。

表 4-4-1

幸福感變項敘述分析

變項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幸福感	1. 非常不幸福	33	0.5
	2. 不幸福	193	3.0
	3. 一般幸福	1988	30.9
	4. 幸福	3122	48.4
	5. 非常幸福	1108	17.2

N =6444

第二節 背景變項對幸福感、信用卡行為之差異分析

本節針對不同背景與「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進行分析，以下將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ANOVA）分析說明資料差異狀況。

壹、 獨立樣本 T 檢定

基於本篇研究假設，欲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個人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是否存有差異以及差異情況如何，以下主要針對背景變項中「性別」、「是否為共產黨員身分」、「有無上過理財課程」三部分進行差異性統計分析。

一、「性別」與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

根據本研究如表 4-2-1 資料顯示，於性別當中，在自評幸福感上，女性平均值 3.82 大於男性 3.76 分，且具有顯著差異（$p < .01$），表示女性相較男性幸福。此結果在過往研究結果相符（Argyle, 1987; Argyle et al., 1990; Rim, 1993），因男女性本身在社會中承載的性別角色、社會分工有些不同，多半女性需擔負情感水準高的工作（Wood, Rholes, & Whelan, 1989）。亦或是女性多為家庭的核心而相對男性收授的社會支持多（陸洛，1998），故相較男性更易體驗情感、反應情緒。而在信用卡欠款餘額上，男性平均值 4226.25 元大於女性 2379.65 元，且具有顯著差異（$p < .01$），表示男性的欠款餘額明顯多過於女性。與本研究假設 1-1、2-1 相符，不同性別在幸福感、欠款餘額中具有顯著差異。

表 4-2-1

性別對幸福感、欠款餘額之 T 檢定

向度	性別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檢定
幸福感	男	3240	3.76	0.79	-3.431**
	女	3204	3.82	0.76	
欠款餘額	男	3240	4226.25	29409.00	3.165**
	女	3204	2379.65	15344.30	

N =6444 **p*<.05 ***p*<.01 ****p*< .001

二、「共產黨員」與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

在共產黨員身分中，在自評幸福感上，身分為共產黨員的幸福感平均分數 3.87 大於非共產黨員身分 3.76 分，且具有顯著差異（p <.001）。意即具共產黨員身分之幸福感高於非共產黨員身分者。此研究結果與過往研究相符，考量東方文化下的個人與社會關係，常以「群體」方式建立社會支持、社群網絡（彭錦鵬等人，2012）。過往在中國城市調查研究顯示，黨員身分與政治參與度均可提升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宋麗娜、西蒙·阿爾普頓、肖輝，2014)。在欠款餘額上，具共產黨員身分平均值 2275.64 元，低於非共產黨員身分 3648.29 元，且具有 1%顯著水準。兩項結果與本研究假設 1-4、2-4 相符，是否為共產黨員身分別在幸福感、欠款餘額中具有顯著差異。

表 4-2-2

共產黨員身分對幸福感、欠款餘額之 T 檢定

向度	黨員身分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檢定
幸福感	是	1597	3.87	0.74	4.769***
	否	4847	3.76	0.79	
欠款餘額	是	1597	2275.64	12200.50	-2.834**
	否	4847	3648.29	26179.07	

N =6444 *p<.05 **p<.01 ***p< .001

三、「有無上過理財課程」與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

接著在有無上過理財課程中，自評幸福感上，有上過理財課程之分數為 3.83 分，高於無上過理財課程 3.78 分，具有顯著差異（p <.05）。另外在欠款餘額中，有上過課程之欠款餘額平均值為 6030.83 元，高於無上過理財課程之平均值 2638.80 元，且具有 1%顯著差異。兩項結果與本研究假設 1-4、2-4 相符，是否為共產黨員身分別在幸福感、欠款餘額中具有顯著差異。

表 4-2-3

有無上過理財課程對幸福感、欠款餘額之 T 檢定

向度	有無上過理財課程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檢定
幸福感	有	1272	3.83	0.77	2.018*
	無	5171	3.78	0.78	
欠款餘額	有	1272	6030.83	39440.37	2.996**
	無	5171	2638.80	17438.27	

N =6443 *p<.05 **p<.01 ***p< .001

註：「有無上過理財課程」中，含一個遺漏值

壹、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檢定）

為了解不同「年齡分群」、「教育程度」、「健康狀況」之幸福感與信用卡欠款餘額的狀況，故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一、「年齡」與「幸福感」變異數分析

在變異數分析表中，通過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齡對幸福感的差異不顯著，F值為1.174，顯著p值=0.32。此部分的結果與過往文獻相符，幸福感不因年齡的改變而出現顯著差異，原因恐在於不同年齡階段受到不同幸福感因子的影響，背後恐因年齡的變化適當調整自己的目標（Campbell, Converse, &Rodgers, 1976; Rapkin & Fischer, 1992），如生理需求的滿足、戀愛、結婚、經濟、健康或是個人的自我實現…等。在幸福感的綜合評估上，以單一年齡的觀點，難解釋幸福感在人一生中的影響效果。

二、「年齡」與「信用卡欠款餘額」變異數分析

首先於變異數同質性分析中，Levene統計量F值等於15.219，顯著性p值=0.000<0.05，表示五組變異數非同質，故在此調整使用Welch法，得出漸進分佈F值為12.869，顯著p值=0.000，達顯著水準。接續使用「無假設相同變異數」的Games-Howell事後比較，研究發現「30歲以下」的欠款餘額平均數顯著高於「51~60歲」，平均值差異為3666.66元（p=.003），而「31~40歲」的平均欠款餘額顯著高於「41~50歲」、「51~60歲」、「61歲以上」，平均數差異分別是1967.95 (p=.05)、3664.32（p=.000)、3275.77（p=.017）。「41~50歲」的平均欠款餘額顯著高於「51~60歲」的平均欠款餘額，平均值差異為1696.37元（p= .003）。

表 4-2-4

年齡分群對幸福感、欠款餘額之 ANOVA 分析結果

向度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事後比較
幸福感	1. 30歲以下	1232	3.81	0.79	1.174	
	2. 31~40歲	1901	3.79	0.77		
	3. 41~50歲	1681	3.77	0.75		
	4. 51~60歲	1031	3.77	0.81		
	5. 61歲以上	598	3.83	0.78		
欠款餘額	1. 30歲以下	1232	4714.35	34738.33	6.39***	1>4
	2. 31~40歲	1901	4712.02	25610.87		2>3
	3. 41~50歲	1681	2744.07	17160.39		2>4
	4. 51~60歲	1031	1047.70	6689.64		2>5
	5. 61歲以上	598	1436.25	21436.82		3>4

N =6443 **p*<.05 ***p*<.01 ****p*<.005

註：「年齡」中，含一個遺漏值

三、「教育程度」與「幸福感」變異數分析

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未通過變異數同質性分析，故在此調整使用Welch法，得出漸進分佈F值為2.479，顯著p值=0.044，研究發現教育程度對幸福感的差異不顯著。這與過往實證研究相符，教育程度與幸福感上的關聯並不強烈，與收入、身體健康較有關連性。

四、「教育程度」與「信用卡欠款餘額」變異數分析

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未通過變異數同質性分析，故在此調整使用Welch法，得出漸進分佈F值為2.639，顯著p值=0.032，達顯著水準，並使用Games-Howell事後比較，教育程度為「高職、大專或大學本科」的欠款餘額平均數顯著高於「小學」，平均值差異為1472.35元（p=.029），教育程度為

「初中、高中、中專或職高」顯著大於「小學」，平均值差異為2734.460元（p=.000）。其中教育程度為「高職、大專或大學本科」、「初中、高中、中專或職高」顯著高於「小學」，與過往中國大陸實證結果相符，採用2011年中國城鎮家庭微觀調查，發現戶主學歷與居民信用卡使用顯著正相關，意即選擇信用卡時的學歷越高，欠款餘額也可能跟著變多。另考量因教育程度高的居民家庭更可能持有信用卡或負債透過正規方式借貸，故在欠款餘額中平均數相對高。

表 4-2-5

教育程度對幸福感、欠款餘額之 ANOVA 分析結果

向度	教育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事後比較
幸福感	1. 無上過學	71	3.70	0.85	2.479[a]	
	2. 小學	371	3.71	0.85		
	3. 初中、高中、中專或職高	2856	3.77	0.79		
	4. 高職、大專或大學本科	2886	3.82	0.75		
	5. 研究所以上	260	3.75	0.76		
欠款餘額	1. 無上過學	71	8814.08	60323.40	5.677*	4>2 3>2
	2. 小學	371	1264.04	6774.34		
	3. 初中、高中、中專或職高	2856	2736.39	19238.82		
	4. 高職、大專或大學本科	2886	3998.50	27354.23		
	5. 研究所以上	260	3338.17	16185.62		

N =6444 **p*<.05 ***p*<.01 ****p*<.005

註：[a]幸福感中Welch法的F值，顯著p值=0.044。

五、「健康狀況」與「幸福感」變異數分析

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未通過變異數同質性分析，故在此調整使用Welch法，得出漸進分佈F值為140.241，顯著p值=0.000，接續使用Games-Howell事後比較，健康狀況為「一般」的幸福感顯著高於「不健康」，平均值差異為0.22（p=.000）；「健康」的幸福感顯著高於「不健康」、「一般」，平均值差異分別為0.51（p=.000）、0.29（p=.000）。意即自評健康的受訪者較一般與不健康者更加幸福。此研究結果與過往實證中相符，當健康狀況低落，恐使心理狀態變差，將可能使得主觀幸福感下降。

六、「健康狀況」與「信用卡欠款餘額」變異數分析

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通過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在變異數分析中，得出F值為0.155，顯著p值=0.857，未達顯著水準，意即不同健康狀況對欠款餘額無顯著差異。

表 4-2-6

健康狀況對幸福感、欠款餘額之 ANOVA 分析結果

向度	健康狀況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事後比較
	1. 不健康	335	3.41	0.89		2>1
幸福感	2. 一般	2365	3.63	0.75	140.241***	3>1
	3. 健康	3742	3.92	0.75		3>2
	1. 不健康	335	3191.24	28747.03		
欠款餘額	2. 一般	2365	3523.03	23582.36	0.155	
	3. 健康	3742	3184.51	22948.37		

N =6442 *p<.05 **p<.01 ***p<.005

註：「健康狀況」中，含兩筆遺漏值

七、綜合論述

關於本研究假設一、二當中，在不同「性別」、「共產黨員身分」、「健康狀況」與「有無上過理財課程」變項對幸福感具有顯著差異。另外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是否為共產黨員身分」與「有無上過理財課程」變項對欠款餘額上具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中，僅 1-2「不同年齡階段之個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1-3「不同教育程度之個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2-5「不同健康狀況之個人信用卡欠款餘額有顯著差異」未受到支持。表示在不同年齡階段、教育程度上，與幸福感的關聯並不強烈，另在個人信用卡欠款餘額上，不同健康狀況並無顯著差異。

參、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在性別對幸福感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具有顯著差異，而年齡分群對幸福感的 ANOVA 分析中未達顯著，然而為檢驗過往研究中提到在幸福感的綜合評估上，以單一年齡的觀點，難解釋幸福感在人一生中的影響效果。故將性別與年齡納入影響幸福感的變項，欲進一步了解兩因子間是否有交互作用效果。在此使用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由下表可看出，性別此變項對幸福感之主要效果具有顯著性（F=6.639，p=0.010），而年齡分群對幸福感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199，p=0.309）。特別的是，兩者變數交乘項後，研究顯示性別在不同年齡區間對幸福感上顯著（p=0.011），意即性別因不同年齡階段對幸福感具有顯著差異。

表 4-2-7

性別、年齡分群對幸福感之 two way ANOVA 分析報表

	SS	df	MS	F
性別	3.978	1	3.978	6.639*
年齡分群	2.875	4	.719	1.199
性別*年齡分群	7.801	4	1.950	3.254*
誤差	3854.964	6433	.599	

註：a. R 平方 = .005（調整的 R 平方 = .003）
*p<.05 **p<.01 ***p<.005

整體女性的幸福感大致大於男性。其中兩者的交叉點在於 41~60 歲之間，出現女性幸福感隨年紀下滑，而男性隨年紀增長的狀況。個別來說，女性在 30 歲以前，此年紀幸福感平均達至最高，然而在 31~60 歲之間，卻出現下滑趨勢，原因恐在東方國家中，女性乘載的性別角色與社會分工有明顯區分，華人社會的女性多半在此年齡階段，常面臨婚姻、勝任照顧小孩的主要角色。根據 2015 年台灣《未來 Family》和遠見民調合作的調查顯示，超過一半（55%）有子女的家庭認為，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主要是由女性來做，另外只有 17.5%由男性負責（今

周刊，2015）。因此女性在此階段中，恐同時扮演多重身分與背負社會期待，故在幸福感較為低落。然而女性於 61 歲後，再次出現轉折點，女性幸福感隨年齡增長而上升，此結果與過往研究一致，高齡女性幸福感大於男性（Rim, 1993）。然而男性平均年齡約略 30 歲前，幸福感隨年齡增長逐漸下滑，於 31 歲後出現轉折點，隨年齡增長，幸福感開始上升。整體來說，與過往部分研究實證相符，年齡與性別對落在中間的年齡階段，幸福感最低（Hayo & Seifert，2003；榮方，2016；高順岳，2017），可能因素在於青壯年正處於事業巔峰期，面臨經濟責任與壓力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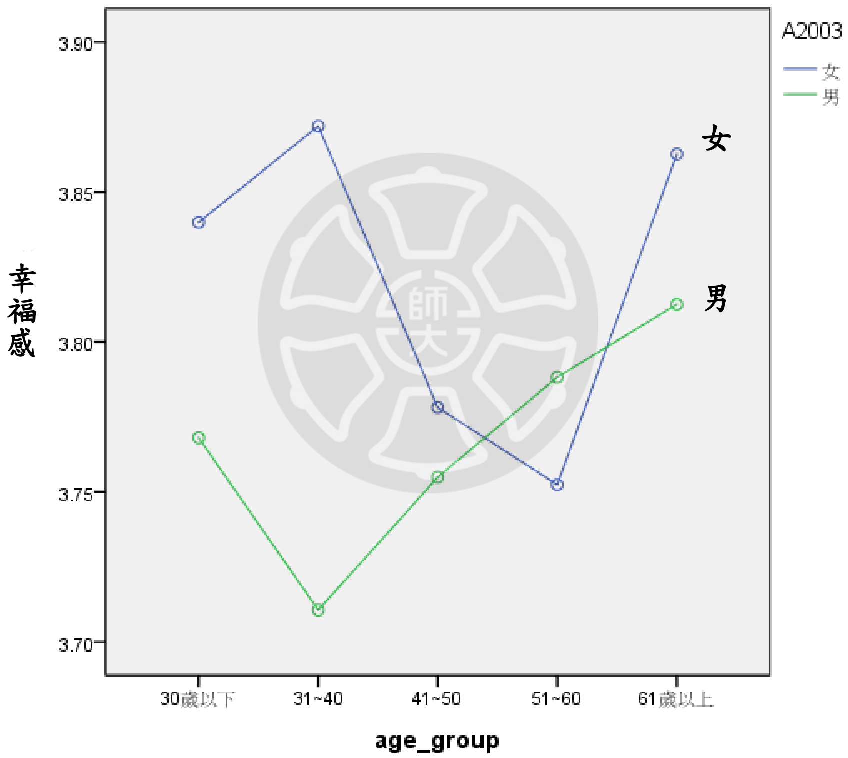

圖 4-2 性別與年齡區間交叉效果圖

第三節 相關係數矩陣

本節針對背景變項、自變項與依變項進行 spearson 相關分析說明。

壹、 年齡、理財知識、理財態度與教育程度

針對表 4-3-3 相關係數顯示，年齡與教育程度中的相關性為-0.311 顯著負相關，意即年齡與教育程度呈現負向關係。再者針對理財知識、理財態度與教育程度上具有顯著正相關 0.263、0.286，原因恐在於學校中有機會吸收更多理財相關知識、技能和工具，使他們能夠培養理財態度，故能相對提升理財知識、理財態度上的表現。

貳、 理財知識、理財態度、風險態度與信用卡欠款餘額

針對表 4-3-3 相關係數顯示，「理財知識、理財態度、風險態度」與「信用卡欠款餘額」關聯分別為 0.041、0.056、0.069，且皆達顯著正相關，意即當理財知識越高、理財態度中越關注金融資訊者，或在風險態度中願選擇高風險高報酬者，信用卡欠款餘額越高。然而此結果與俄羅斯的實證研究相符，理財知識、理財素養越高，越可能透過正規金融機構借貸（Klapper, Lusardi & Georgios, 2013），故與信用卡欠款餘額呈現顯著正相關。再者，理財態度與風險態度的相關係數為 0.358，達顯著低度正相關，意即當越關注金融資訊，其風險態度越願選擇高風險高報酬。此結果不難想像，因當人們對金融產品有一定的熟悉或了解後，即可能會更有信心選購高風險報酬的商品。

參、 健康狀況、資產、收入與幸福感

在相關係數中，背景變項中「健康狀況、資產、收入」與「幸福感」關聯分別為 0.210、0.103、0.065，且皆達顯著微弱正相關，意即當自評健康狀況較佳、資產越多，或是收入越多，自評幸福感越高。此結果與過往研究相符，不同收入對幸福感確實存在顯著差異（Frey & Stutzer, 2000; Tella, MacCulloch, & Oswald, 2001)，所得與生活福祉兩者具有顯著正向相關（Campbell, 1981；陳密桃、陳玲婉，2005)，且與台灣實證資料中研究結果相同（Tsou, Liu, 2001)。其中資產與收入間的相關係數為 0.487，達中度正相關，意即資產越多，其收入也會越多。當收入提高時，滿足生活必須外，可能轉而購買資產或是將儲蓄的錢轉向投資，故兩者間具一定的相關性。

肆、 幸福感與信用卡欠款餘額

在相關係數中，依變項「幸福感」與自變項「信用卡欠款餘額」間的關聯性為-0.021，為負相關。意即當幸福感低落時，恐伴隨信用卡欠款餘額；相反的當幸福感提升時，信用卡欠款餘額越低。在本研究皮爾森相關分析中，兩者未達顯著。過往研究指出客觀負債影響幸福感效果不一，恐須納入行為人的心理、認知感受作為其中的傳導途徑。如貸款償還壓力會影響心理健康，進而影響幸福感之外，另個負向途徑為影響健康狀態。借款人透過生活的節儉以達快速還款的目的，進而造成身體抵抗差，得病機率上升，間接影響幸福感（Balmer et al., 2006)。負債對幸福感恐間接產生正負向不同的效應，因此在此顯著性不強。

表 4-3-3

背景變項、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年齡	1									
2. 教育程度	-.311**	1								
3. 健康狀況	-.203**	.143**	1							
4. 資產	.049**	.167**	.051**	1						
5. 收入	-.017	.113**	.063**	.487**	1					
6. 理財知識	-.099**	.263**	.037**	.105**	.087**	1				
7. 理財態度	-.042**	.286**	.072**	.194**	.163**	.231**	1			
8. 風險態度	-.251**	.246**	.105**	.119**	.108**	.174**	.358**	1		
9. 幸福感	-.002	.030*	.210**	.103**	.065**	.004	.021	-.015	1	
10. 信用卡欠款餘額	-.059**	.018	-.005	.108**	.110**	.041**	.056**	.069**	-.021	1

N=6444 $^{*}p<0.05$ $^{**}p<0.01$

註：性別、共產黨員、有無上過理財課程變項並無放入此相關係數

第四節 次序羅吉特迴歸模型（OLM）

壹、次序羅吉特迴歸模型

次序羅吉特迴歸用於預測給定一個或多個自變數的次序依變數，被認為廣義的多元線性迴歸（張紹勳、林秀娟，2018），本研究中的迴歸模型中，依變項為幸福感，同時納入背景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共產黨員身分、健康狀況、資產、收入、有無上過理財課程」及自變項「理財知識、理財態度、風險態度與信用卡欠款餘額」等影響因素。

在依變數 happiness=1 中，估計值=-4.515，指的是估計切點，也就「非常不幸福與不幸福」之間的截斷值（cutoff value）。故五個幸福感向度中，共計有四個切分點，分別為-4.515、-2.554、0.201、2.528。另外對於 happiness=1 而言，這是潛在變數的估計切點，用於區分「非常不幸福與不幸福」，當預測變數的值=0，也就是當其他背景變項、自變項皆為 0 時，受訪者的潛在變數≤-4.515，happiness 被歸到「非常不幸福」。相同的，當潛在變數介於 0.201、2.528 之間，受訪者將被分類為「幸福」。

在此迴歸中，進行概似值檢驗，以確認自變項偏迴歸係數是否全為 0，於模型在未引入自變量時，-2 對數概似值為 14790.143，引入自變項後縮減至 14376.664，卡方值為 413.479，自由度為 12，P<0.001，同下表所示，意即至少有一個自變量的偏迴歸係數不為 0，換句話說，將影響因素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共產黨員身分、健康狀況、資產、收入、有無上過理財課程、理財知識、理財態度、風險態度與信用卡欠款餘額」12 個自變項納入考量的模型，其適配度好於僅包含常數項的模型，且模型具有顯著適配度。

在本次迴歸係數中使用 Wald 卡方檢定虛無假設，統計結果在「性別、教育程度、非共產黨員、健康狀況、資產、風險態度、信用卡欠款餘額」中具有顯著效果。當性別為女性的 log-odds 迴歸係數為=0.210，達 1%顯著，

意即女性較男性幸福感高。其次，教育程度上，使用原始問卷編碼，採 1~9 個等級，研究發現學歷越高，幸福感越低。在非共產黨員身分上，log-odds 迴歸係數為-0.252，且達顯著負相關，意即當非共產黨員幸福感較共產黨員身分低，此結果恐與社群互動有關，過往研究顯示，因社會支持可以滿足個體的基本需求，提升個體的心理健康與幸福感，使其有能量去因應身邊的環境變化，進而產生幸福感（Bolger & Amarel, 2007）。在健康狀況下，log-odds 迴歸係數為 0.721，達 1%顯著，意即自評健康狀況越好，幸福感越高。與 2015、2016 年台灣人民生活滿意度與健康狀況顯著正向結果相符（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在資產方面，log-odds 迴歸係數為 5.823E-8，達 1%顯著，表示資產越多，幸福感越高。不難想像當經濟需求被滿足，生活滿意度就會提升，往更好的生活品質前進，增加幸福感。另外在風險態度上，研究結果顯示 log-odds 迴歸係數為-0.066，顯著負相關，意即當越願負擔高風險、高風險商品者，其幸福感越低。過往研究指出，風險態度與理財福址相關（Joo & Grable, 2004）。原因恐在於追求高風險報酬產品時，同時需承受較大的獲利或報酬壓力，致使心理負擔沉重，削減幸福感。最後在信用款欠款餘額中，具有顯著負相關，log-odds 迴歸係數為-1.832E-6，此與本研究 假設相符，當信用卡欠款餘額越多時，恐削弱幸福感，如同英國超過五年的追蹤研究，因尚未償還之非抵押的受訪者，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負向影響（Brown, Taylor & Price, 2005）。多國實證研究也指出，負債對負向情緒有正向相關，因財務壓力導致如抑鬱、焦慮、憤怒和症狀增加（Krause et al., 1991; Adams & Moore, 2007; Drentea & Reynolds, 2012; Archuleta et al., 2013）。

然而在本研究中，「年齡、收入、有無上過理財課程理財知識、理財態度」並未達顯著。在本次迴歸模型中，年齡在此採用連續變數，呈如上方 two way ANOVA 分析，在五個年齡區間中，女性與年齡群組彼此交成分析後，發現於 31 後至 60 歲之間，幸福感逐漸下降，61 歲以上，女性幸福感逐漸上升，而男性於 30 歲前幸福感逐漸下降，從 31 歲後逐漸上升。意即本身年

齡對幸福感來說並沒有一致的表現，甚至因性別的差異，在不同的年齡區段展現不同的幸福感。收入方面，過往研究指出不同收入對幸福感確實存在顯著差異，且高收入者的主觀幸福感高於低收入者（Campbell, 1976），所得與生活福祉兩者具有顯著正向相關（Campbell, 1981；陳密桃、陳玲婉，2005），且在台灣實證資料中研究結果亦同（Tsou, Liu, 2001）。在有無上過理財課程、理財知識、理財態度上，在上方 T 檢定與 ANOVA 分析中，對信用卡欠款餘額有顯著差異，在此對幸福感無顯著相關。而理財知識、態度恐透過理財行為，間接影響幸福感。這點雖不能斷定，但過往文獻曾提及，理財素養與行為間具顯著影響（O’Neill, Xiao, Bristow, Brennan & Kerbel, 2000；Joo & Grable, 2004），研究結果也與一份針對台北縣國中進行的研究相符，學生理財素養與理財行為大部分向度間達到顯著正相關（曾永清、呂秋萍，2014）。

表 4-4-1

幸福感迴歸模型結果

變項	估計	標準誤差	Wald
幸福感= 1.00	-4.515***	.267	285.882
幸福感= 2.00	-2.554***	.213	143.187
幸福感= 3.00	.201	.205	0.953
幸福感= 4.00	2.528***	.208	147.674
性別=女	.210***	.049	18.679
性別=男	0	.	.
年齡	.002	.002	0.545
教育程度	-.033**	.016	3.996
共產黨員=不是	-.252***	.060	17.767
共產黨員=是	0	.	.
健康狀況	.721***	.042	296.866
資產	5.823E-8***	9.348E-9	38.804
收入	8.907E-8	7.882E-8	1.277
有無上過理財課程=無	-.059	.065	0.825
有無上過理財課程=有	0	.	.
理財知識	-.008	.034	0.059
理財態度	.016	.025	0.416
風險態度	-.066***	.022	8.982
信用卡欠款餘額	-1.832E-6*	1.031E-6	3.160
-2 對數概似		14376.664	
卡方		413.479 ***	
假 R 平方（Cox 和 Snell）		.062	

*p<.1 **p<0.05 ***p<0.01

貳、 性別、共產黨員身分勝算比（odds ratio）

一、 性別與幸福感的卡方檢定

首先針對性別與幸福感說明交叉列表，其中不管男女性，在幸福感=4 中的人數皆最多。然而在性別與幸福感兩項類別變項中，卡方檢定值= 15.589，p=0.004，表示性別與幸福感兩個類別變數具有顯著相關。以下呈現性別與幸福感的交叉表：

表 4-4-2

性別、幸福感交叉列表

		happiness					總計
		1	2	3	4	5	
gender	男	20	118	1029	1541	532	3240
	女	13	75	959	1581	576	3204
總計		33	193	1988	3122	1108	6444

卡方檢定= 15.589, df=4, p=0.004

二、 性別的幸福感勝算比

在此處我們使用次數分對數模型（propotional odds model），一般說來，會使用差異比率（odds ratios），亦可稱勝算比（以下皆稱之）。

然而透過卡方檢定僅能知道兩個獨立變數是否有顯著相關，並無法呈現兩者相關性的強弱，故在此使用「勝算比」此部分的勝算比是以由定義成功及失敗的機率決定，在此主要分析的是，選填不同幸福感間的群組，在男女性下的機率比值。也就是在「某個幸福感組」為女性的勝算比，是男性的多少倍數。τ 稱為臨界值（threhold）或分界點（cutpoint）。

我們可以從表 4-4-3 勝算比中，針對性別在幸福感的勝算，在其他狀況不變下，「非常不幸福」往「不幸福」的機率比，女性受訪者的勝算是男性受訪者的 1.222 倍，亦即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有走向高層次幸福

感；相同道理，由「不幸福」往「一般幸福」的機率比，女性受訪者達到「幸福」的勝算是男性受訪者的 1.238 倍，為 4 個數值中最高的。其他幸福感亦有相同結果，女性受訪者達到往更高幸福感的勝算均較男性為高。

表 4-4-3

性別對幸福感之勝算比

		分界點（cutpoint）			
	τ	2	3	4	5
男	logit	-4.515	-2.554	0.201	2.528
	odds	0.011	0.078	1.223	12.528
女	logit	-4.725	-2.764	-0.009	2.318
	odds	0.009	0.063	0.991	10.155
	odds ratio	1.222	1.238	1.234	1.234

三、 共產黨員身分之幸福感勝算

針對共產黨員身分與幸福感說明交叉列表，其中不管是否為共產黨員身分，幸福感選填4的人數皆最多，然而以整體分布情況來說，非共產黨員人數較共產黨員多。然而在共產黨員與幸福感兩項類別變項中，卡方檢定值= 24.986，p=0.000，意即共產黨員與幸福感兩者變數間具有顯著差異。

表 4-4-4

共產黨員身分、幸福感交叉列表

		happiness					總計
		1	2	3	4	5	
communist	是	3	35	436	822	301	1597
	不是	30	158	1552	2300	807	4847
總計		33	193	1988	3122	1108	6444

卡方值檢定=24.986, df=4, p=0.000

在共產黨員身分中，針對共產黨員相對非共產黨員的勝算，在其他狀況不變下，「非常不幸福」往「不幸福」的機率比，共產黨員受訪者的勝算是非共產黨員受訪者的 1.273 倍，亦即共產黨員比非共產黨員更容易有走向高層次幸福感；相同道理，由「不幸福」往「一般幸福」的機率比，共產黨員受訪者達到「幸福」的勝算是非共產黨員受訪者的 1.282 倍。其他幸福感亦有相同結果，共產黨員受訪者達到往更高幸福感的勝算均較非共產黨員為高。其中「非常幸福」的勝算比為 1.287，為 4 個數值中最高。

表 4-4-5

共產黨員對幸福感之勝算比

		分界點（cutpoint）			
	τ	2	3	4	5
非黨員	logit	-4.263	-2.302	0.201	2.78
	odds	0.014	0.1	1.573	16.119
黨員	logit	-4.515	-2.554	0.201	2.528
	odds	0.011	0.078	1.223	12.528
	odds ratio	1.273	1.282	1.286	1.287

參、 預測機率

接續欲了解，當背景變項、自變項固定時，在不同幸福感層級中的預測機率為何。在此主要計算預測機率的平均數、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意即所有觀察值中的最小預測機率，而最大值指所有觀察值中的最大預測機率。樣本在「非常不幸福」中，最小預測機率為 0，最大預測機率為 0.03。在五個幸福等級中，以「幸福」達平均人數最多，其機率為 0.4841，其中「非常不幸福」平均人數最少，機率為 0.0051，幸福感在「一般幸福、幸福」中間，其平均數加總機率達 79%以上。在預測機率最大值中，以「一般幸福」0.59 機率值最大，其次為「非常幸福」，其機率值為 0.56；在「非常不幸福」中最大值為 0.03，是五個最大預測機率值中最小者。由上述可知，於「一般幸福、幸福、非常幸福」皆有較高的預測機率。

表 4-4-6

幸福感之預測機率

向度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非常不幸福	0.0051	0.0029	0	0.03
不幸福	0.0299	0.0157	0	0.15
一般	0.3095	0.0902	0.07	0.59
幸福	0.4841	0.0501	0.20	0.52
非常幸福	0.1714	0.0655	0.03	0.56

肆、 邊際效應

此處欲了解邊際效應的偏微分改變，也就是當其他變數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某一個自變數對幸福感預測機率的係數改變，故此邊際效應可以評估每個幸福感間距間，變數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首先從表 4-4-7 可知，性別在「非常不幸福(happiness=1)」中，預測機率的邊際效應等於 0.0009；而落在其它區域「不幸福（happiness=2）」、「一般幸福（happiness=3）」的預測機率分別增加 0.0054、0.0405；而在「幸福（happiness=4）」、「非常幸福（happiness=5）」中下降 0.0185、0.0284，意即低於「一般幸福感」中，男性較能感受幸福感；然而當達至「幸福」之上後，男性傾向選擇「幸福」、「非常幸福」的預測機率減少 0.0185、0.0284，也就是女性在此階段較能感受幸福感。

在年齡方面，在「幸福、非常幸福」中，邊際效應為 1.41E-04、2.16E-04，在「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中邊際效應為-7.20E-06、-4.13E-05、-3.08E-04。意即低於「幸福」中，年齡每增加一歲，傾向選擇「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的預測機率降低，反之，當達至「幸福」之上後，年齡越大，越能感受幸福感，其中以「非常幸福」的邊際效應最高。

在教育程度、理財知識、風險態度、信用卡欠款餘額方面，於「幸福、非常幸福」中邊際效應均為負值。隨自變數增加一單位，「非常幸福」預測機率分別降低-0.0044、-0.0011、-0.0088、-2.47E-07，然而在這四個變數中，隨幸福感程度越大，邊際效應呈現負向變化。於「一般幸福」中的邊際效應最大，在一般幸福中的預測機率，變數每增加一單位，幸福感預測機率會增加 0.0063、0.0016、0.0126、3.57E-07 單位。意即在「一般幸福感」中，隨教育程度、理財知識、風險態度、信用卡欠款餘額越高，幸福感越大，而當達至「幸福」之上後，反而幸福感降低。

在是否為共產黨員、健康狀況、資產、收入、有無上過理財課程、理財

態度方面，於「幸福」至「非常幸福」中均有正向邊際效應，且於「非常幸福」中預測機率變化最明顯，意即在「非常幸福」中的預測機率，變數每增加一單位，幸福感分別增加為 0.0356、0.0973、7.86E-09、1.20E-08、0.0080、0.0022。

表 4-4-7

各變項對幸福感之邊際效應

	幸福感				
	1	2	3	4	5
性別	0.0009	0.0054	0.0405	-0.0185	-0.0284
年齡	-7.20E-06	-4.13E-05	-3.08E-04	1.41E-04	2.16E-04
教育程度	0.0001	0.0008	0.0063	-0.0029	-0.0044
共產黨員	-0.0011	-0.0062	-0.0479	0.0196	0.0356
健康狀況	-0.0033	-0.0186	-0.1392	0.0637	0.0973
資產	-2.63E-10	-1.51E-09	-1.12E-08	5.15E-09	7.86E-09
收入	-4.02E-10	-2.30E-09	-1.72E-08	7.88E-09	1.20E-08
有無上過理財課程	-0.0003	-0.0015	-0.0113	0.0050	0.0080
理財知識	0.0000	0.0002	0.0016	-0.0007	-0.0011
理財態度	-0.0001	-0.0004	-0.0031	0.0014	0.0022
風險態度	0.0003	0.0017	0.0126	-0.0058	-0.0088
信用卡欠款餘額	8.27E-09	4.74E-08	3.54E-07	-1.62E-07	-2.47E-07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次選取 2015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資料中，選取 6444 筆樣本，其中性別的男女比例近乎一致，約有七成受訪人年齡位於 31~60 歲的區間。然而在平均幸福感為 3.79 分，且自評幸福與一般幸福約佔八成，顯示受訪者普遍對生活感到幸福。故在本研究中，往下探討各項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故選用次序羅吉特迴歸模型，求出幸福感的預測機率與邊際效應。另外，在本次樣本中，值得留意的是，平均信用卡欠款餘額為 3308.11 元，標準差達 23509.445 元，樣本的標準差距甚大。在理財知識的向度中，平均分數為一分，且以分數為「零分」的人數最多。在理財態度中，平均理財態度為 2.72。其中以「一般關注」的人數最多，「很少關注」人數次之。然而針對這般結果，後續也會提出幾點研究與實務上的建議。

壹、 部分背景變項、自變項對幸福感有顯著解釋力

在次序羅吉特迴歸中，統計結果發現「女性、教育程度、非共產黨員、健康狀況、資產、風險態度、信用卡欠款餘額」對幸福感具有顯著效果。其中在女性、健康狀況、資產中達顯著正相關，意即其他變數保持不變下，當增加女性樣本、自評健康越高、擁有越多資產下，其幸福感越高。另外在教育程度、非共產黨員、風險態度、信用卡欠款餘額中達顯著負相關，意即在其他變數保持不變下，當教育程度越高、非共產黨員增加、喜愛高風險高報酬、信用卡欠款餘額越多，幸福感越低。其中在信用卡欠款餘額中，log-odds 迴歸係數為-1.832E-6，此與本研究假設相符，當信用卡欠款餘額越多時，恐削弱幸福感。

再者欲進一步了解，性別與是否為共產黨員身分在不同幸福感程度上的勝算比。在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於不同幸福感中女性受訪者達到往更高幸福感的勝算均較男性為高。另外在共產黨員身分中，在其他狀況不變下，不同幸福感中共產黨員達到往更高幸福感的勝算均較非共產黨員高。

貳、 背景變項、自變項對幸福感的邊際效應

本研究中欲細部探討，在邊際效應中，男性在低於「一般幸福感」中，較能感受幸福感；然而當達至「幸福」之上後，男性傾向選擇「幸福」、「非常幸福」的預測機率減少，女性在此階段較能感受幸福感。在年齡方面亦同，低於「幸福」中，年齡每增加一歲，傾向選擇「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的預測機率降低，反之，當達至「幸福」之上後，年齡越大，越能感受幸福感，其中以「非常幸福」的邊際效應最高。然而教育程度、理財知識、風險態度、信用卡欠款餘額在「幸福、非常幸福」中，邊際效應為負值，當達至「幸福」之上後，反而幸福感降低。另外在共產黨員、健康狀況、資產、收入、有無上過理財課程、理財態度中，在「幸福」至「非常幸福」中均有正向邊際效應，且於「非常幸福」中預測機率變化最明顯，意即在「非常幸福」中的預測機率，變數每增加一單位，將提高幸福感。

參、 人口變項對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大多具有顯著差異

在「性別」、「是否為共產黨員」、「有無上過理財課程」、「健康狀況」四項背景變項中對幸福感具有顯著差異，然而在「年齡」、「教育程度」上則無。具有顯著差異的原因，恐在於男女性在社會中承載的性別角色、社會分工有關（Wood, Rholes, & Whelan, 1989），亦或是女性多為家庭的核心而相對男性收授的社會支持多（陸洛，1998）。而在共產黨員身分、健康狀況中，也都得出與過往研究相符的結果。較特別的是在教育程度與年齡上，結果與過往部分文獻相符，教育程度與幸福感上的關聯並不強烈，與收入、身體健康較有關連性。另外在幸福感中，過往研究說明，非因年齡的改變而出現顯著差異，原因恐在於不同年齡階段受到不同幸福感因子的影響，背後恐因年齡的變化適當調整自己的目標（Campbell, Converse, &Rodgers, 1976; Rapkin & Fischer, 1992）。故在本研究發現，針對性別

會因不同年齡階段對幸福感確實具有顯著差異，其中女性在 31 後出現轉折點開始與幸福感呈現負向關係，直至 60 歲後隨年齡增長，幸福感逐漸上升。故在此也證實了性別與年齡對幸福感具有交織性，且在不同年齡段恐有不同的影響效果。

另外在信用卡欠款餘額中，「性別」、「是否為黨員」、「有無上過理財課程」、「年齡」、「教育程度」五項背景變項皆在幸福感上有顯著差異。其中較特別的是，在「健康狀況」中對信用卡欠款餘額無顯著差異，原因恐在於健康狀況不佳未必與使用信用卡欠款掛勾，較有影響的應該為受訪者的心理狀態，當健康狀況低落，恐使心理狀態變差，將可能使得主觀幸福感下降。

肆、 不同背景變項、自變項對幸福感、信用卡欠款餘額有顯著相關

「教育程度」、「健康狀況」、「資產」、「收入」與「幸福感」有顯著正相關，國內也有研究發現收入對幸福感有正向影響（陳密桃、陳玲婉，2006）。另外當健康狀況越良好，將可能伴隨越高的幸福感。然而在「資產」、「收入」、「理財知識」、「理財態度」、「風險態度」與「信用卡欠款餘額」中有顯著正相關，其中與「年齡」有顯著負相關。意即當理財知識越高、理財態度中越關注金融資訊者，或在風險態度中願選擇高風險高報酬者，其信用卡欠款餘額越高。其中在理財態度與風險態度的關聯係數為 0.358，達顯著低度正相關，意即當越關注金融資訊，其風險態度越願選擇高風險高報酬。此結果不難想像，因當人們對金融產品有一定的熟悉或了解後，即可能會更有信心選購高風險報酬的商品。

第二節 建議

壹、 對中國當局信用卡承辦中心建議

隨著網路電子商務、P2P（peer to peer）、行動支付等新興支付媒介出現，信用卡此金融商品勢必需要跟上時代演進，進行行業中創新與管理再進化，建議適應線上的經營模式，如推出網路卡、網路審核、網路貸款…。再者因中國的信用卡的銀行業務鮮少走出國際，僅有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等從事海外信用卡業務，然而處在全球貿易的浪潮下，向外拓展商機，拓展國外市場勢必是個趨勢。

貳、 對中國政府、教育相關單位建議

一、增強醫療品質、加強社會網絡

幸福感受到許多生活因素影響，影響方式與途徑也都不盡相同，在經濟快速起飛的中國，除了關注經濟資產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外，近年更逐漸重視居民主觀幸福感的狀況，如醫療衛生投入，包含專業的醫療技術、民眾就醫時的醫療服務品質滿意度，提升醫療品質，改善人們的健康滿意度與健康狀況，有助增加幸福感。再者，增強社會聯繫，有助擴展自己的社會網路培植深厚的社會信任，提高居民的幸福感。長遠來說，在經濟快速發展下，增強民生需求，將有助促進社經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提升理財教育，培養正確理財概念

在國家層級中，建議加強法規支持與建立專責教育機構或組織，推動小至學童到成人的理財知識短、中、長期普及計畫，另可推動中國全面性定期的國民理財素養調查機制，檢視教育培育計畫的成效，進一步修正與加強提升中國國民的理財素養。再者在信用卡持卡人的風險意識上，可提供長期安全培訓，針對持卡人的消費觀念及行為進行正確的引導，平時做好信用卡使

用情況紀錄，並針對自身還款能力進行客觀評估，遵守時限準時歸還欠款。

三、加強個別化宣導，重視普惠金融

可針對不同年齡層、地區需求，進行個別化宣傳，借鏡英美國家行以多年的理財教育，可針對中國擬訂適合該國情的各級學齡課程目標，分階段讓學生循序學習理財相關概念、樹立正確的理財價值觀，並且增強理財技能與面對未來金融風險等意識。此外，隨中國經濟發展快速下，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城鎮與農村金融機構的營業網點分布不均，以及欠缺知識普及教育的機會，故積極推動普惠金融，也就是提供社會各階層和群體以其可負擔的成本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對於中國未來政策上將是須正視的重心。

四、大陸當局可持續關注幸福感之因素

在此資料庫中僅以一題問項說明幸福感，未來可著重發展主觀幸福感調查與每年追蹤調查。更重要的是，致力於研析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進一步提升中國大陸居民之幸福感。另外針對現行中國居民常使用的消費支付方式，如行動支付，亦可納入幸福感影響因素探討。

參、 對個人之建議

第一，本研究發現男性大致較女性幸福感低落，建議男性可多培養興趣，從事自己所愛之事，充實心靈涵養或追求更舒適理想的生活。針對女性，年齡位於 31~60 歲之間，幸福感隨年紀下滑。在此階段的女性多半面臨事業、婚姻家庭、孝親、育兒…等多重角色替換，承受不同的挑戰與壓力。建議此階段女性可多方評估自己適合的生活模式，正視自己的價值觀與信念，選擇自己所愛之事，勇敢追求人生的成就感。因此，在生活中盡力去應用與發揮個人的優勢長處與美德，即可獲得真實快樂及達到忘我經驗的深度滿足感（余民寧，2015），用心經營自己的生活，人人都可以促進身心靈成長，過著有意義、幸福的人生。

第二，本研究指出，隨健康狀況越好，伴隨越高的幸福感，針對健康狀態，可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促進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透過運動有效緩解緊張、被壓抑的負向情緒，亦能提升心情與專注力。然而也可定期追蹤健康檢查，留意身體機能狀況，即刻針對症狀即刻調整或治療，積極掌握個人的健康狀況。

再者，隨資產、收入越高，伴隨越高的幸福感。故個人可在生活之際，培養良好的理財習慣、時常接收理財新知外，長遠規劃個人的人生基金，亦或是為未來突發狀況預留準備金，將有助於在面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維持生活品質，提升幸福感。

肆、 未來研究建議

一、可轉朝相關負債探討對幸福感的影響效果

然而針對負債對幸福感的影響效果，仍有許多面向有待了解，包含像房屋貸款、汽車貸款、生產經營負債、醫療負債...等。或許會牽涉到其他影響幸福感的途徑。

二、可持續追蹤資料庫資料，並進行縱斷面追蹤分析

本次選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資料庫（CHFS），為中國西南財經大學於 2010 年成立的公益性學術調查研究機構，樣本遍及中國 29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351 個縣（區、縣級市），1396 個村（居）委會，樣本規模為 37289 戶，故在樣本對於推論母體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取得數據庫為 2015 年橫斷面資料，另因調查中心約每兩年完成一次全國調查，之後如欲持續追蹤中國居民的幸福感與信用卡欠款餘額的狀況，可使用不同年份的調查資料進行縱斷面追蹤資料分析。

三、提供未來施測者的問卷建議

第一，因本次僅挑選使用信用卡之用戶進行幸福感研究，故研究推論的群體較為特定，未來欲擴大研究對象，可進一步了解有無使用信用卡的民眾在幸福感上的表現。第二，在性別、年齡的背景變項上，亦可加入婚姻狀態，進一步分析三者交織性狀況。另外，在本研究 中因受限於問卷的題目，故在理財知識、理財態度、幸福感的概括面向上無法更周全考量，未來研究者如欲自行發展問卷調查，可依本研究結果，再依照國情或問卷需求，研擬更多構面問題或發掘更多影響幸福感之因素，或另補充其他的研究問項。

參考文獻

壹、 中文部分

中國政府網（2020）。**2019 年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取自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17/5492275/files/53314a9224dd4b78b6dcafa3493da503.pdf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2018 年 12 月 2 日）。**調查中心介紹**。取自 https://chfs.swufe.edu.cn/researchcenter/intro.html

中國產業信息（2018）。**2018 年中國信用卡市場發展現狀及發展前景分析**。取自 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1806/654052.html

中國債務規模已超過 GDP 的 300% 約佔全球總債務的 15%--IIF（2019 年 7 月 18 日）。**中國財經**。2020 年 11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if-china-debt-ratio-0718-thur-idCNKCS1UD0NQ

甘梨、王紹文（2019）。**中國家庭金融租賃研究**。臺北市：財經錢線文化。

白鶴祥（2017）。金融知識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金融博覽，4**，32-33。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國民幸福指數調查暨主觀幸福感研究期末報告**。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研究（編號：RES-103-03），未出版。取自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521610483ZXKUP4S8.pdf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美好生活指數－主觀幸福感**。取自 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28111181971.pdf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國民幸福指數調查暨主觀幸福感研究期末報告**。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研究（編號：RES-105-02），未出版。取自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9411162842XUOZUPXC.pdf

余民寧（2015）。**幸福心理學－從幽谷邁向巔峰之路 從幽谷邁向巔峰之路**。新北市：心理出版社。

吳書榆（譯）（2013）。**幸福經濟學：幸福是滿足過生活？還是人生有目標？全美最具影響力智庫的關鍵報告**（原作者：Carol Graham）。臺北市：漫遊者。（原著出版年：2010）

吳衛星、吳錕、王璡（2018）。金融素養與家庭負債—基於中國居民家庭微觀調查數據的分析。**經濟研究，1**，97-109。

宋麗娜、西蒙·阿爾普頓、肖輝（2014）。中國城市地區的生活滿意度：構成要素與決定因素。**國外理論動態，6**，90-101。

李江一、李涵、甘犁（2015）。家庭資產−負債與幸福感:「幸福−收入」之謎的一個解釋。**南開經濟研究，5**，3−23。

杜蕾、胡少華（2004）。中國信用卡市場的坎坷成長路。**銀行家，6**，51-53。

幸福感調查—結婚，人生才美滿？男性比女性更想婚（2015 年 9 月 11 日）。**今周刊**。2021 年 5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509110015/%E5%B9%B8%E7%A6%8F%E6%84%9F%E8%AA%BF%E6%9F%A5%E2%94%80%E7%B5%90%E5%A9%9A%EF%BC%8C%E4%BA%BA%E7%94%9F%E6%89%8D%E7%BE%8E%E6%BB%BF%EF%BC%9F%E7%94%B7%E6%80%A7%E6%AF%94%E5%A5%B3%E6%80%A7%E6%9B%B4%E6%83%B3%E5%A9%9A

林姿儀（2007 年 11 月 14 日）。回顧 2005 年-2006 年之台灣卡債風暴，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分析報告。**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取自 https://www.npf.org.tw/2/3558

林薏禎（2020 年 11 月 19 日）。IIF：今年底全球債務總額恐達 277 兆美元 再創紀錄新高。**鉅亨網**。2021 年 5 月 18 日，取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543827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2015 年 6 月 29 日）。

姚開屏（2000）。簡介與評論常用的一般性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量表兼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測驗年刊，47**(2)，111-138。

苗元江（2007）。幸福感概念模型的演化。**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8**(4)，42 – 46。

高順岳（2017）。居民幸福感影響因素實證研究。**統計與決策，5**，116-118。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0）。**教育大辭書**。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6349/

國務院辦公廳（2015）。**關於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的指導意見**。取自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13/content_10289.htm

張允碩 （2011 年 4 月 13 日）。當心中國卡債風暴。**天下雜誌，418**。2021 年 5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1762

張瀚文、杜秋實（2010）。中國信用卡發展與管理研究。**價值工程**，8-9。

陳有真、賈志永與羅亞林（2010）。學術界關於幸福感研究的述評。**天府新論，1**，40-45。

陳岩（2021 年 1 月 18 日）。中國經濟：去年 GDP 增速 2.3% 或成全球唯一正增長。**BBC 中文。**2021 年 5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5702760

陳密桃、陳玲婉（2006）。國小學童母親的人格特質與親職壓力、幸福感之相關研究。**高雄師大學報：教育與社會科學類，20**，1-20。

傅聯英（2018）。信用卡支付如何影響主觀幸福感？—基於薩繆爾森幸福公式的研究。**財經研究，44**(3)，32-44。

彭錦鵬、黃東益（2012）。**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補助研究計畫（計畫編號：G12111）。臺北市：臺灣民主基金會。

彭錦鵬（2014）。**影響主觀幸福感因素之研究**。「2014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當前全球民主實踐的再思考：困境、挑戰與突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與李俊達合著）

曾永清、李麗香（2012）。情境式理財課程影響國中生理財素養之研究。**中等教育，63**(2)，111-131。

曾永清（2013）。理財教育的概念及其相關效益分析。**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報，24**，1-41。

曾永清、呂秋萍（2014）。父母理財教導對國中生理財素養與理財行為關係之研究。**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報，23**，139-172。

曾永清（2019）。美、英及中三國理財教育國家策略發展經驗對臺灣的啟示。**北商學報，35**，25-41。

黃明聖（2015）。**台灣家庭及政府債務負擔與金融穩定之關聯及其影響分析**。中央銀行委託研究報告（計畫編號：103cbc-金 1）。中央銀行。

黃富櫻（2008）。主要國家央行推廣金融教育的比較與借鏡。**國際金融參考資料，55**，152-196。

黃興海（2005）。我國銀行卡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金融研究，11**，72-82。

黃錦寧、韋荷琳（2019）。加快完善我國金融知識普及教育體系的思考。**區域金融研究，563**(8)，26-29。

董曉翠（2014）。新視界二部曲--再探主觀幸福感。**主計月刊，708**，66-75。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暨其策略合作夥伴（2019 年 3 月 19 日）。**資誠發布《2019 全球消費者洞察報告》數位行為將主宰消費市場 做好四策略迎接經營挑戰**。取自 https://www.pwc.tw/zh/news/press-release/press-20190319.html

廖志明（2020 年 7 月 20 日）。我國信用卡業務還有多大的發展空間？**天風證券**。2021 年 5 月 11 日，取自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007201392896673_1.pdf?1595258227000.pdf

榮方（2016）。基於 CG2013 調查資料探究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現代商業，7**，189-190。

銀行法（2018 年 4 月 17 日）。

劉立凡（2010）。到底多健康？健康光譜的意涵與演化。**台灣老年學論壇，5**，1-11。

劉宏、明瀚翔、趙陽（2013）。財富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基於微觀資料的實證分析。**南開經濟研究，4**，95−110。

鄭旭智、張育哲、潘倩玉、林克明（2002）。**類別與受限依變項的迴歸統計模式**（原作者：J. Scott Long）。臺北市：弘智文化。（原著出版年：1997）

黎子文（2015）。我國信用卡市場發展回顧及新挑戰分析。**中國信用卡，12**，63-66。

謝俊寧（2018）。我國信用卡業務發展探究。**現代商業，36**，85-86。

韓立岩、杜春（2011）。城鎮家庭消費金融效應的地區差異研究。**經濟研究，1**，30-42。

貳、 英文部分

Adams, T., & Moore, M. (2007). High-risk health and credit behavior among 18- to 25-year-old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56*(2), 101–108.

Akerlof, G. A., & Shiller, R. J. (2009).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rews, F. M., & Withey, S. B. (1976).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s perception of life quality*. New York, America: Plenum Press.

Archuleta, K. L., Dale, A., & Spann, S. M. (2013). College students and financial distress: Exploring debt, financial satisfaction, and financial anxiety. *Journal of 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 24*(2*)*, 50–62.

Argyle, M. (1987). 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 *London & New York*: Routedge.

Argyle, M., & Crossland, J. (1987). The dimensions of positive emo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2), 127–137.

Argyle, M., & Lu, L. (1990). The ha*ppiness of extraver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1*, 1011-1017.

Balmer, N., Pleasence, P., Buck, A., & Walker, H. (2006). Worried Sick: The Experience of Debt Proble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Health, Illness and Disability.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5*(1), 39-51.

Berti, Anna & Monaci, Mariagrazia. (2011). *Third graders'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of banking: Restructuring or accre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8, 357-371.

Bolger, N., & Amarel, D. (2007).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visibility on adjustment to stress: Experimental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3), 458-475.

Borden, L. M., Lee, S., Serido, J. & Collins, D. (2008). Changing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 through seminar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9*, 23-40.

Braunstein, S., & Welch, C. (2002). Financial literacy: An overview of practice, research, and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88*(11), 445-457.

Britt, S., Cumbie, J. A. & Bell, M. M. (2013). The Influence of Locus of Control on Student Financial Behavior.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47*(1), 178-185.

Brown S., Taylor K., Price S. W. (2005). Debt and distress: Evaluat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credit.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6*(5), 642-663.

Brown, M., van der Klaauw, W., Wen, J. & Zafar, B. (2013).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the debt behavior of the Young.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9*(9), 2490–2522.

Brown S. & Gray D.(2016). Household Finances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mparison Effect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53*(45), 17-36.

Campbell, A., Converse, P. E., & Rodgers, W. L. (1976).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Russell Sage.

Campbell, A. (1981). *The sense of well-being in America: Recent patterns and trends.* New York: Mcgraw-Hill.

Campbell, John (2006). Household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61, 1553-1604.

Clayton, M., L. Z. Jose & J. O. S. Wilson. (2015). *Does Debt Affect Health? Cross Country Evidence on the Debt-health Nexu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30, 51-58.

Delafrooz, N., & Paim, L. (2015).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wellness among Malaysia work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 Business Management, 3*(2), 11-28.

Di Tella, R., MacCulloch, Robert J., & Oswald, Andrew J. (2001). Preference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 335-341.

Diener, E. (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34-43.

Diener, E. (2006).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indica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ll-being.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 151-157.

Drentea, P., & Lavrakas, P. J. (2000). Over the limit: The association among health, race and deb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0*(4), 517–529.

Drentea, P., & Reynolds, J. R. (2012). 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debt and SES for mental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24*(4), 673–695.

Easterlin, R.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David, R. and Reder, 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asterlin, R.& Angelescu, L. (2007).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 Cross Sectional and Time Series Evidence* (USC CLEO Research Paper No. C07-7). Retrieved from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980354

Education Counts (2007). *Profile & Trends 2007: New Zealand's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cationcounts.govt.nz/home

Eurostat (2015). *Eurostat regional yearbook 2015*. Luxembourg:European Union.

Ferrans, C. E., & Powers, M. J. (1985)。Quality of life index：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 8*(1), 15-24。

Frey, B. & Stutzer. A. (2000). Happines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110*(466), 918-938.

Frey, B., & Stutzer, A. (2007). CESifo seminar series.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A promising new cross-disciplinary field*. MIT Press.

Furnham, A., & Brewin,C.R(1990).Personality and happin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11*(10), 1093-1096.

Hayhoe, C. R., Leach, L. J., Turner, P. R., Bruin, M. J., & Lawrence, F. C. (2000). Differences in spending habits and credit use of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34*, 113–133.

Haynes-Bordas, R., Kiss, D. E., & Yilmazer, T. (2008).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behavior and account usage: Evidence from a ‘second chance’ program.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9*(3), 362-390.

Hayo & Seifert. (2003).Subjective economic well-being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4*(3), 329-348.

Headey, B., & Wearing, A. (1989). Personality, life eve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owards 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Person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4), 731-739.

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8*, New York: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Hilgert, M. A., Hogarth, J. M. & Beverly, S. G. (2003). Household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behavior.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89*(7), 309-322.

Hira, T. K., & Mugenda, O. (1999b).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f-worth and financial beliefs, behavior, and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91*(4), 76.

Hunter, Jennifer & Heath, Claudia.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 Card Use Behavior and Household Well-Being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Ethics of Credit Use. *Journal of 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 28,* 213-224.

Jennifer L. Huntera & Claudia J. Heathb.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 Card Use Behavior and Household Well-Being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Implications for the Ethics of Credit Use. *Journal of 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 28*(2):213–224.

Joo, S. H., & Grable, J. E. (2004). *An exploratory framework of the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5(1), 25-50.

Kahneman, D., & Krueger, Alan B. (2006).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 3-24.

Kahneman, Daniel & Deaton, Angus.(2010).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38), 16489-16493.

Klapper, L. A. Lusardi & A. P. Georgios. (2013). *Financial Literacy and its Consequences: Evidence from Russia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7, 3904-3924。

Knight J.，Song L. (2009). Gunatilaka 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4)*：635-49.

Kourilsky, M.L. (1977). *The Kinder-Economy: A Case Study of Kindergarten Pupil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Concepts.*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77, 182 - 191.

Krause, N., Jay, G., & Liang, J. (1991). Financial strai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the American and Japanese elderly. *Psychology and Aging, 6*(2), 170–181.

Lu, L., & Argyle, M. (1991). Happiness and cooper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12*, 1019-1030.

Lu, L., & Shih, J. B. (1997). Personality and happiness: Is mental health a mediato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2(2),* 249–256.

Lusardi, Annamaria & Olivia S. Mitchell (2007a). Baby Boomer Retirement Security: The Role of Planning, Financial Literacy, and Housing Weal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4*(1), 205-224.

Lusardi, Annamaria & Olivia S. Mitchell. (2007). Financial Literacy and Retirement Preparednes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Education. *Business Economics.42*(1), 35-44.

Lusardi, Annamaria, Olivia Mitchell, and Vilsa Curto (2009). Financial Literacy Among the Young: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sumer Policy.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4*(2), 358-380.

Lusardi, A., Mitchell, O. S., & Curto, V. (2010). Financial literacy among the young.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4*(2), 358–380.

Lusardi, Annamaria & Mitchell, Olivia & Curto, Vilsa. (2014).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inancial Sophistication in the Older Population.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13*(4), 347-366.

Lusardi, Annamaria & Peter Tufano (2015). Debt Literacy, Financial Experience, and Overindebtedness.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14*(4), 332-368.

Mian, A., Sufi, A. (2010) Household Leverage and the Recession of 2007–09. *IMF Economic Review ,58*(1), 74–117.

Mills, R., Grasmick, H., Morgan, C., & Wenk, D. (1992). The Effects of Gender,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Economic Strain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Family Relations, 41*(4), 440-445.

Monticone, C., 2010. How Much Does Wealth Matter in Acquisition of Financial Literacy?.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4*(2), 403-422.

Nickerson, Schwarz, Norbert & Diener. (2007). Financial aspirations, financial success, and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Who? And how?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8*(4), 467-515.

O'Neill, B., Xiao, J., Bristow, B. J., Brennan, P. Q., & Kerbel, C. (2000). *MONEY 2000TM: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among program participants.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Education, 18*, 35-42.

OECD (2011). *OECD Launches Your Better Life Index*.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ecd.org/.

Okun, M. A., Stock, W. A., Haring, M. J., & Witter, R. A. (1984).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2), 111-132.

Perry, V. G. & Morris, M. D. (2005). Who Is in Control? The Role of Self-Perception, Knowledge, and Income in Explaining Consumer Financial Behaviour.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39*(2), 299-313.

Pierre, E. & Shreffler, K.. (2013). Credit card usage among older adults: Assessing financial literacy and pressures. *Journal of Extension, 51*(3), 1-9.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2012). *PISA 2012 Financial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ecd.org/pisa/pisaproducts/46962580.pdf

Rampichini & Schifini D'Andrea. (1998). Studie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Ital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4*(1), 41-69.

Rao, A., & Barber, B. L. (2005). *Financial well-being: Descriptors and pathways.* TCAI Working Paper 5–2.

Rapkin, B. D., & Fischer, K. (1992). *Framing the construct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terms of older adult' personal goal.* Psychology and Aging, 7(1): 138-149.

Rim,Y. (1993).Values, happiness and family structure variab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15*(5), 595-598.

Robb, C. A. & Woodyard, A. S. (2011).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best practice' behavior. *Journal of 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 22*(1), 36-46.

Schwartz, B., Ward, A., Monterosso, J., Lyubomirsky, S., White, K., & Lehman, D. R. (2002). Maximizing versus satisficing: Happiness is a matter of cho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83*(5), 1178-1197.

Seligman, M. E. P., Ernst, R. M., Gillham, J., Reivich, K., & Linkins, M. (2009). Positive education: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classroom interventions.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35*(3), 293-311.

Shim, S., Xiao, J. J., Barber, B. L., & Lyons, A. C. (2009). Pathways to life success: A conceptutal model of financial well-being for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 708-723.

Tatarkiewicz, W. (1976). *Analysis of Happiness*.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Tay, L., Batz, C., Parrigon, S., & Kuykendall, L. (2017). Deb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other side of the income-happiness coi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18*(3), 903–937.

The World Bank Group. (n.d.). *GDP growth (annual %).* Retrieved from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

Tsou, MW., Liu, JT. (2001). *Happiness and Domain Satisfa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 269–288.

Veenhoven, R. (1984). *Conditions of Happiness*. Dordrecht, Netherlands:D. Redel.

Veenhoven, R. (1991). Is Happiness Rela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1), 1-34.

WHO. (1947).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WHO.

Wood, W., Rhodes, N., & Whelan, M. (1989). Sex differences in positive well-being: A consideration of emotional style and marital statu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6,* 249-264.

Worthy, S. L., Jonkman, J., & Pike, L. B. (2010). Sensation-seeking, risk-taking, and problematic financial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1*, 161–170.

Xiao, J. J., Sorhaindo, B., & Garman, E. T. (2006). Financial behaviours of consumers in credit counse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30*(2), 108–121.

Xiao, J.J., Shim, S., Barber, B., & Lyons, A. (2007). *Academic success and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behaviors matter.* (Technical Report) TCAI, University of Arizona.

Xiao, J. J., Tang, C., & Shim, S. (2009). Acting for happiness: Financial behavior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2*(1), 53–68.